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孫善豪 博士

論蘇新戰後的民族認同 (1945-1981)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Su Xin After World War II
(1945-1981)

研究生：陳彥鈞

Yen-Chun Chen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January, 2014

摘要

終身奉獻於台灣的左翼運動先鋒蘇新(1907~1981)，於日治時代成為台灣共產黨員起，致力於社會階級革命橫跨數十載，是台共組織中少有的智囊文膽，相當重視文字宣傳力量。本文關注的焦點在於，為何在日治時代從事激進武力革命路線的蘇新，從二戰結束國民政府遷台到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年半間，台灣政局腐敗、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當時從事報社編輯的蘇新，卻不曾對國民政府做出任何批判，遑論激進的武力革命，對照起舊台共領導人謝雪紅，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與國民政府軍隊爆發衝突，蘇新為何放棄階級武力革命路線實則令人費解。若深入研究光復初期的各式文獻資料，即可發現蘇新不僅發表政論文章維護國民政府、三民主義，無視於光復初期的混亂局勢，往後隨著國民政府的迫害流亡香港，蘇新對於中國的民族認同情感更毫無遮掩的展露而出，運用報章社論大肆抨擊蔣氏政權，並不斷呼籲台灣應歸屬於中國領土一部分，不應走向獨立或遭他國託管，如此的民族信念，即便到蘇新逝世前仍堅持不輟。本論文將運用蘇新長期身為新聞人所留下的大量文獻資料，透過其撰寫的新聞報導、政論文章、回憶錄與自傳等各式文獻，了解蘇新的民族主義思想，是如何影響其階級批判精神。

關鍵詞：蘇新、台灣共產黨、民族主義、光復初期

目錄

緒論	1
第一章 早年生平與思想淵源	8
第一節 日治時代的殖民經濟.....	8
第二節 蘇新早年生平與教育背景	11
第三節 台灣共產黨的興起與瓦解.....	18
第二章 光復初期的政治動向.....	25
第一節 戰後台灣局勢	25
第二節 蘇新的政治批判與動向.....	32
第三節 武力革命的延續.....	44
第三章 流亡香港期間的思想轉變.....	52
第一節 輾轉流亡.....	52
第二節 海外宣傳戰.....	55
第三節 蘇新的台灣歷史論述.....	64
第四章 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號角.....	79
第一節 政治生涯的起落.....	79
第二節 一個中國的民族信念.....	83
結論.....	95
參考書目.....	98
表附錄.....	101

緒論

研究動機

回顧 20 世紀台灣左翼運動史，台灣共產黨的崛起過程可謂曇花一現，從 1928 年成立，到 1931 年遭日本警方檢舉而瓦解，期間僅僅不過三年的時間，台灣共產革命運動自此全面宣告失敗，直到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舊台共成員遭到國民黨迫害而流亡於香港短暫停留，往後轉入中國共產黨也處處遭受箝制打壓，台灣左翼運動者的革命歷程實則無比艱辛。但如此頗具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主題，其相關研究成果即便到今日卻不甚豐碩，除了組織成員稀少以外，台共的當代實質政治影響力也相當有限，加上長期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的箝制下，左翼運動的相關研究也只能在解嚴後慢慢進行，況且，受限於史料的緣故，關於台共的研究，大多集中探討日治時代黨組織成員的政治經歷、黨的決策權力運作過程及其成敗探討，往後光復初期到中國共產黨時期，台共成員的政治經歷則鮮少著墨。

有鑑於此，筆者對於這段左翼運動歷程最感興趣的部分，則是關於台共成員在光復後的政治動向與立場轉變，尤其是民族思想的部份。由於台灣經歷了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卻在戰後一夕間劃入中國版圖之內，異族的離去及回歸祖國，台灣的政局看似有無限的發展可能性，舊台共成員們是以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嶄新局勢，究竟是不再過問政治？抑或重拾往日的政治熱情繼續投入共產運動？或者放棄共產主義思想，選擇它路延續政治生命？如果他們持續進行政治生涯，是以什麼樣的心態面對與台灣脫離關係長達五十年的中國？這段時間做了什麼樣的政治活動與言論？更為重要的問題是，他們是抱持著大漢民族的民族榮耀，一如光復初期的台灣百姓歡迎國民政府接受？抑或無視民族問題，延續過去日據時期強烈階級精神批判統治、資產階級？換言之，民族認同是否影響舊台共成員的共產思想，是筆者所欲探討的核心問題。

若閱讀台灣共產黨的相關研究著作，多以台共領導人謝雪紅(1901-1970)爲主軸來作探討，以謝雪紅在光復初期的政治動向來看，仍然延續著舊台共所沒有完成的左翼革命，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籌備會」，聯合各式左傾組織與相關人員，以待時機準備可能發生的武力革命，最終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領導「二七部隊」在台中、南投一帶與國民政府軍隊發生衝突，雖然革命以失敗收場而逃往香港，但由此可見謝雪紅在光復初期的政治立場，依舊以「階級」作爲革命對象的依據判准，進行推翻統治、資產階級的武力革命。反觀本文的研究對象蘇新，就沒有如謝雪紅持續極左路線，反而有其他的政治選擇。

縱然蘇新的歷史知名度不若台共創黨元老等人來的響亮，但若仔細分析其相關文獻資料，可以發現他是一位相當值得探究的歷史人物。首先，蘇新政治活躍期間跨越了日據時代、光復初期以至中共建政時期，與台灣共產黨及創黨元老們經歷了每一個歷史階段，其政治生涯幾乎就是台灣共產運動的縮影。二者，長期肩負新聞工作任務的蘇新，具有豐富的文字工作歷練，成爲左翼運動的重要文膽，同時，他也是台共黨中留下最多著述的成員。最後，目前蘇新的相關研究尚不算太多，多是依附在謝雪紅、林木順(1904-?)、楊克煌(1908-1978)等人下被描述，少有獨立專門的研究，關於蘇新生平較爲確定的部份爲日治時代的政治動向，至於光復初期與中共時期，蘇新扮演何種政治角色則較爲模糊不清，況且，本文所欲探討蘇新民族思想的部分也鮮少被提及。經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蘇新的後半段政治生涯，仍存有一定的探討研究空間。

研究回顧

由於本論文探討的焦點，在於蘇新戰後初期的民族主義思想，屬於政治態度與立場的範疇，主要著重的時間範圍，從二次大戰後至蘇新流亡香港，而後轉往中國共產黨效力，期間長達三十餘年。若回顧台灣左翼運動史的相關研究，焦點大多集中於日治時期，也礙於史料有限的困境，光復後至中共建政期間，舊台灣

共產黨成員的相關研究著墨甚少，本論文的探討焦點人物蘇新的專門研究更是罕見，很難與台共領導者謝雪紅等人相比擬，但在進一步深入探討之前，仍必須從這些少數的研究著作中，掌握正確的文獻資料與研究方向。

近人最早對蘇新有深入探討的研究著作，當屬台灣當代文、史學研究學者陳芳明(1947-)先生的《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一書，¹此書乃陳芳明先生基於台灣左翼歷史長期被遺忘的危機而寫，主題聚焦於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發展，對台灣共產黨的組織架構及其下成員的政治思想與行動，皆有著相當清楚的描寫，同時也兼顧了描述大時代背景脈絡與人物細節的優點，從創黨領導人謝雪紅、林木順及蘇俄、日共的扶持，至後期上大派翁澤生、青壯派蘇新的路線之爭，整本書的架構脈絡清晰易懂，至於本論文探討的對象蘇新，在此書中則特別獨立出一個章節，其中也描述了蘇新在戰後的政治歷程，陳芳明先生認定蘇新批判國民政府的立場，以發表政論文章的方式，針砭日益艱險的時局，²但在加入中共後，則逐漸失去革命批判的態度，成為北京當局的傳聲筒。

而陳芳明先生的另一本左翼歷史著作《謝雪紅評傳》也非常重要，《謝雪紅評傳》與《殖民地臺灣》不同在於，此書以謝雪紅為主軸描寫台灣共產黨的歷史發展，對於蘇新描寫的成份並不多，但因歷史背景、台共組織的發展緣由、人物動向，皆有更為細膩的描寫，時間範疇也從日據時代延伸至光復、中共時期，並有各式的史料文獻佐證，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另一本以蘇新為研究主軸的論文，是黃文源先生的《蘇新的革命道路——一位台共在東亞共產運動的矛盾與困境》，此論文以詳盡的第一手史料做為文本基礎，從日記、檔案、報紙、回憶錄到口述訪問，整體且細膩的呈現蘇新生涯各階

¹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2006年。

²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176-181。陳芳明先生認為蘇新在光復初期扮演反映民怨的媒體人，從而走向武裝抗暴，但卻又提到蘇新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礙於史料有限而難以辨識，前後似有矛盾之處。

段的政治經歷，同時以台灣共產黨的發展為論文副軸，描繪出台灣極左運動的整體發展情勢。但此論文對蘇新的分析，大部份都集中在於日據時代，對於戰後光復時期，以至投效中共的這段時間，僅只有一個章節的份量，而黃文源先生對於蘇新後半生涯的描述，基本上與陳芳明先生採相同的論調。³綜觀陳芳明、黃文源先生兩人的研究，都有相當嚴密的文獻考據作為文本基礎，無論蘇新在日治時期或光復後的人生，都有鉅細靡遺的生平解析。但本論文欲探討的民族意識與認同的構想，皆在兩者的研究中鮮少被提及。

至於本論文所使用蘇新的第一手文獻資料，多取自於《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及《永遠的望鄉人-蘇新文集補遺》兩本著作，此兩本文集收錄了蘇新大量的親筆文獻，包含自傳、政論文章、通訊報導、私人通信及口述訪問等各式第一手資料，⁴因此得以一窺蘇新的政治態度與立場。另外，蘇新於香港流亡期間撰寫的台灣歷史《憤怒的臺灣》一書，⁵同樣可用於窺探蘇新的政治動機與民族史觀。

問題意識

由於台灣經歷了長達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面臨分離長達半世紀之久的「祖國」統治，筆者即相當好奇台灣共產黨成員在光復後的政治態度與心境轉變，身為前台共成員的蘇新有過什麼政治活動或言論？對於國民政府與當時省籍衝突的看法？更重要的問題是，蘇新的民族認同為何？在初步閱讀蘇新相關的研究與文獻後，許多耐人尋味的疑問便漸漸浮現，自 1931 年蘇新與上大派的翁澤生(1903 -1939)掌握了台灣共產黨主導權後，確立了黨的激進武力革命路線，意

³ 黃文源，《蘇新的革命道路——一位台共在東亞共產運動的矛盾與困境》，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博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2010 年，頁 112-115。黃文源先生則強調蘇新在擔任報刊編輯期間，多半刊登批評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報導，但這樣的看法，則是緣於蘇新自傳中的口述說法，詳見《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06-233。

⁴ 其中包含蘇新本人口述資料，由台灣作家葉榮鐘(1900-1978)次女葉云女士進行訪問。

⁵ 蘇新，《憤怒的臺灣》，臺北：時報文化，1993 年。

圖推翻殖民剝削的台灣總督府，日治時期蘇新的階級意識是如此強烈而不容質疑。但若再檢閱蘇新針對光復初期政局所寫的數篇政論性文章，卻絲毫不見任何批判國民政府的言論，⁶尤其是身處於行政效率低落、經濟蕭條及社會動盪的戰後局勢，本應是蘇新發揮強烈批判精神的重要時機，但令人意外的，當時從事新聞工作的蘇新並未對國民政府做出抨擊，反倒迎合了官方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

若將此時的態度，與他在日據時代的武裝革命主張做出比較，即可輕易察覺兩者有著偌大的差異，若再將蘇新往後所寫的各式文獻做更進一步的檢視，會出現更多疑問流亡香港期間，他一再透過新聞報刊的傳播文宣，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理念，認為台灣不該走向獨立或遭它國託管，⁷到了中共時期，蘇新也不曾批判過中央當局，反倒是不斷強調兩岸統一的目標。種種跡象顯示，蘇新在乎民族問題的程度，似乎更甚於他追求階級平等。

因此，將上述疑問做個簡單整理後，不禁讓筆者聯想到一個概略性的假設，即是政治意識形態追求的原則、理念，似乎會隨著個人的政治歸屬認同感，或另一種意識形態的影響而有所變化，換言之，社會主義者所追求經濟平等、財富均有的原則，可能會受到個人對於國家、民族認同情感的影響，而扭曲甚至消失。本文在此做出保守性的推論，認定蘇新對於中國的「民族認同」，可能超越他本身的「階級認同」，因而讓他失去批判國民政府與中共的力道。⁸事實上，共產運動者的「民族」、「階級」矛盾，是每一位左翼歷史研究者都會碰到的問題：

⁶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93年，頁152-183。蘇新在光復初期共寫過五篇政論文章，分別是〈論人事問題〉、〈再論「糧食問題」〉、〈主義·機構·人物〉、〈農村自衛隊〉及〈紙荒〉。

⁷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206-233。

⁸ 本文使用「民族認同」一詞，而不是「民族主義」，是因為蘇新並沒有具體針對「民族」，做出一套完整的思想論述，他對於中國民族、台灣國家概念的看法，皆散見於其各式文獻中，且似乎對於「中國民族」具有正面情懷和記憶，因此筆者保守稱之為「民族認同」。

在左翼史的研究中，一個普遍遇到的棘手問題，也許是民族原則與階級立場之間的糾葛。⁹

從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歷史矛盾來看，每一位共產主義運動者，都勢必面臨國家、民族認同與經濟平等的階級理念衝突，當然，終身信奉共產主義的蘇新也不例外。因此，為探討蘇新民族情結對其共產信念的影響，本文將針對蘇新撰寫的文章、報導、書籍及書信進行分析，並運用各式第一手文獻詳細敘述各個歷史階段的時代脈絡，比對出蘇新各個時期政治立場及態度的轉變與不變，以了解蘇新對於中國的民族情結是否凌駕自身的階級平等原則，而讓他在人生的後半階段失去了批判、革命的角色，這是本論文欲探討的核心問題。

章節安排

第一章為緒論，將敘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文獻回顧及章節安排。

第二章的內容是蘇新在日治時代的生平簡介，並著重其政治思想的起源與在台灣共產黨的活動。第一節將對日本治台殖民統治的本質做出基本的描述，第二節探討蘇新早年生平，孩童時期的家庭教育及中國式教育的私塾，加上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差別待遇的教育，使蘇新深感民族不平與歧視，同時又受到台灣文化協會的左派思想影響，學生時期即萌發了反殖民意識，並影響往後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第三節簡述台灣共產黨從興起到瓦解的艱辛歷程，及了解蘇新在黨內扮演的政治角色與其立場。

第三章著重分析蘇新在台灣光復初期，發表於各式報刊評判時局的政論文章，及其政治立場的原則，並詳述當時台灣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第一節將描述台灣戰後初期，日益惡化的省籍衝突與經濟狀況。第二節分析蘇新於 1946 年針

⁹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23。

對當時日益惡化的行政人事、糧食產量問題所寫的政論文章，並將文章中的內容與 1946 年台灣的人事、糧食資料等第一手文獻做出比對，可發現蘇新刻意迴避批判行政長官公署，其立場與當時大多數民意相違背。第三節聚焦於前台共領導人謝雪紅，檢視她在光復初期的政治行動，是否也如蘇新一般受到民族認同情感的影響。

第四章敘述蘇新流亡香港期間，持續運用報刊的政治宣傳戰，並分析他撰寫的《憤怒的台灣》一書。第一節將敘述前台共人士流亡香港並等待時機轉變的過程。第二節分析蘇新在香港撰寫多達數十篇的報紙通訊、消息及評論，這些報導來源的內容大多為反對國民黨政府治台，以及反對台灣遭美國託管或脫離中國獨立，此節也將使用相關資料與上述文獻比對，以釐清蘇新的政治標的為何。第三節的焦點放在蘇新留港期間撰寫的《憤怒的台灣》一書，此書以台灣自古是中國一部分領土的概念來詮釋台灣人民的歷史，但這與古代文獻及今日的台灣古代歷史研究成果所呈現的完全不同，此節仍將運用文獻比對，以了解蘇新是否欲運用歷史正當性的功能，建構出附屬於大中國史觀下的台灣歷史。

第五章描述蘇新投奔至中國共產黨後的政治歷程，以及分析他在晚年所寫的文章。第一節將檢視蘇新負責對台廣播進行統一文宣戰的經歷，並簡述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遭到迫害的過程。第二節的內容將探討蘇新在晚年政治平反後所留下的文獻，其中透露出蘇新濃烈的民族信念與對台的思鄉情緒，讓中國一統分裂的兩岸，仍是他逝世前的最大期盼。

最後一章為結論，統整戰後各個階段的政治言論與行動來看，蘇新似乎沒有完全以「階級」做為政治敵人的判準，反倒是對於中國的「民族認同」情感，影響了他的階級批判精神，使的蘇新的共產主義思想，成為附屬於民族主義的次要意識形態。

第一章、早年生平與思想淵源

在探討蘇新戰後的民族認同與思想前，本文仍須將其早年生平作簡短的介紹，並將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政治、經濟脈絡做出具體的描述，以瞭解蘇新政治意識形態形塑的過程與源頭為何，更重要的是，分析蘇新在日治時代的實際行動，與其政治思想的方向與強度，才得以與往後各個人生階段的政治行為及態度做出比較，以看出在時空背景的變遷下，蘇新政治思維的轉變與否。

第一節、日治時代的殖民經濟

自 1895 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遭到割讓而成爲日本殖民地，相較於早已發展出資本主義的日本，歷經中國三百年王朝統治的臺灣，仍處於畜力生產爲主的農業時代，在許多反對接收台灣的人士眼裡，臺灣人民不僅民族複雜多元，且素質低落，充斥各式社會陋習，如鴉片、裹腳、綁辮子等等，加上氣候惡劣、衛生條件極差，對於缺乏殖民地治理經驗的日本，實爲一項艱困的挑戰。¹⁰由於風土民情的不同，加上統治初期治安紛擾，零星反抗不斷，臺灣總督府確立了以「六三法」爲基礎的警察威權政治，在威權體制的政治控制下，臺灣人民受到各種層面的不平等待遇，並引發規模大小不一的反抗行動，從總督府前二十年統治期間的重大武裝抗日行動 如北埔事件、苗栗事件、西來庵事件等等，就可得知日本治臺遇到的重重困難。¹¹

但警察政治的建立，僅是殖民地統治的手段而不是目標，日本從獲取臺灣的那一刻，旋即思考其經濟價值所在，早在 19 世紀後半葉，臺灣因爲開港通商的

¹⁰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臺北：帕米爾出版社，1987 年，頁 11-12。

¹¹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 年，頁 173-174。

影響，人口的自然增加與移入大幅成長，除了糧食作物的墾植外，經濟作物也大量被栽植，尤以茶、糖、樟腦為出口之最。對於甫剛接收台灣的日本當局眼裡，利用台灣既有的農業基礎，來獲取更高的經濟利益實為首要方針。因此在所有台灣出產的經濟作物中，蔗糖最被日人所重視，自 19 世紀末以來，日本的蔗糖需求大幅增加，但在糖業發展上卻屢受打擊，無論質、量都不足以供應日本國內需求，即須仰賴外國進口，¹²從 1894 年日本的砂糖消費量為四百萬擔，但本土生產則僅有八十萬擔，如此可以看出日本對糖的迫切需求。¹³而地理條件適合種植蔗糖的台灣，從開港後幾乎每年蔗糖產量皆突破五十萬擔，最高曾於 1880 年超過一百萬擔，¹⁴ 因此在日本統治台灣以前的 1887 年至 1895 年期間，台灣出口的蔗糖有高達九成輸往日本。¹⁵

日本治台初期，除了改善基礎設施、衛生條件與理番政策外，更確立了以蔗糖為主軸發展的產業方向，鼓勵日本產業來台灣發展。從 1900 年日本成立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後的 20 年間，台灣的經濟主軸聚焦於糖業，到了 1920 年代，加入米糧的生產，蓬萊米成為最大宗的糧食外銷作物。綜括這兩階段，總督府的策略約略是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最高指導方針，至 1930 年之後，則因戰爭需要，總督府對於台灣的經濟重心則轉為工業化。¹⁶雖說各階段的主要不同，但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自然著重在提高農產品或後期工業用品的生產量，以達到供輸日本國內的需求。而此種兼顧發展台灣島內民生經濟與日本宗主國供需的日式資本主義，在所有日本殖民地當中，就以台灣最為成功。

可是就在臺灣總督府的威權統治，日本資本主義漸漸扎根於台灣，建立起現

¹²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60。

¹³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11-12。

¹⁴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 年，頁 25。

¹⁵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30-31。

¹⁶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頁 201-205。

代社會的安定與種種經濟產業的壟斷，台灣本島內的民族和階級衝突旋即接踵而來。臺灣殖民地經驗的成功，實則是壓榨無數台人的心血勞動而來，就以支撐起日本在台統治經濟基礎的臺灣製糖業為例，不僅被日本資本家壟斷，更獨佔甘蔗的採購權，且由日本官方制定甘蔗的數量、收購價格及方法，層層剝削得控制台灣蔗農，¹⁷蔗農階級因而成爲台灣第一個反抗總督府的經濟產業，從 1923 年到 1925 年之間臺灣各地皆發生蔗農要求提高甘蔗收購價格的爭議，其中以二林蔗農組合在 1925 年 10 月，與日本警方發生暴力衝突一事最爲重大，史稱二林事件。

當然，在民族不平等的剝削下，當然不只有蔗糖產業收到經濟壓迫而想改變現況，就在知識分子的引領帶動下，促成了台灣農民階級的團結反抗。受馬列思想薰陶的教師簡吉(1903-1951)，在 1925 年台灣各地發生農民抗爭的情況下，辭去教職走向農民抗爭運動，並組織「鳳山農民組合」，長期巡迴各地農村演講，鼓勵農民向地主階級鬥爭。更於 1926 年 9 月，簡吉擔任發起人組織「台灣農民組合」，組織目的在於團結台灣全島各地的農民組織，以對抗日本長期以來的對台籍農民的經濟剝削，將各地的農民組合統整後，形成鳳山、大甲、曾文、嘉義、虎尾五大支部，成爲日治時期台灣最大規模的農民階級組織。¹⁸

但日本警方於 1929 年 2 月農曆新年期間，突擊逮捕台灣農民組合成員，史稱「二一二事件」，事件中共有五十一人被控違反《治安維持法》，包括簡吉在內，共有十二位農組成員被起訴判刑，領導人簡吉則被判一年，台灣農民組合也成爲非法組織，¹⁹雖然還有殘餘成員進行地下行動，但也在殖民政府的強力鎮壓下被迫停頓。另外，要特別提到農民階級對於殖民剝削的反抗運動，並不是全然由農

¹⁷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295-296。

¹⁸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221-223。

¹⁹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頁 240。

民所進行，許多臺籍中產階級、工商業者也參與其中，因為台籍企業經常受到總督府與日本企業家的控制與監督，各項產業的經濟利益更是遭到日本企業寡斷，同樣身為台灣人的農民階級與工商業者，他們所受的壓迫皆是建構在民族歧視政策下，並非特定經濟產業或階級遭受剝削，如此跨越階級的合作自然而然形成。

20

下一小節將描述蘇新早年的生平經歷，與其政治意識形態的學習歷程，同時也將更進一步分析，臺灣人在政治、教育與心理等各項層面所受到的壓迫，探討如此嚴重民族歧視與不公的時代背景，是如何影響蘇新決定走向武裝抗日的政治旅程。

第二節、蘇新早年生平與教育背景

蘇新於 1907 年 11 月 14 日，誕生在台南縣北門區佳里鎮佳里興，是祖先從福建遷台已降的第五代，由於父親於七歲時亡故，母親又改嫁，加上弟妹早夭，因此蘇新童年時期過的相當孤獨，在少數這時期的文字描述中，特別的是以下這段回憶：

那時，我們最愛唱的是阿媽自己編的兒歌：「月公公，秀才郎，騎白馬，過南唐。過南堂，要作啥，尋阿祖，食月餅。」針對這首童謠，蘇新的阿媽還特地解釋，「『南唐』就是唐山，就是咱祖家的所在。『尋阿祖』就是回老家拜祖。」……我父親和幾個叔伯們，雖然思念家鄉同安，但從來也沒有回去過，阿媽說，是因為沒有路費。²¹

²⁰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295-296。

²¹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79。

在孩提時期，透過祖母編作的兒歌，瞭解自己的祖先是從福建同安而來，與親屬長輩們對祖家的思念。在接觸正規學校教育前，蘇新最先讀到的書是中國倫理經典：一九一四年（八歲）進入村里的書房讀過一部《三字經》和《四書》。²²由上述兩段回憶可得知，同年的蘇新由於受到親人的祖籍認同，及村里中國式私塾教育的影響，對中國有了初步模糊的概念。往後蘇新正式進入就讀公學校，展現了過人的才智：

一九一五年四月(九歲)進入佳里興公學校(即台灣子弟的小學)。
由於家裡人多，田地不多，有足夠的勞動力，不需要我勞動，所以在六年的過程中，都能夠很順利地安心讀書。這養成了以後經常看書的習慣。四年級的時候就會看雜誌，會寫文章投稿，常受到學校的表揚。²³

蘇新談到的公學校，是依據總督府於 1919 年發布的第一次《台灣教育令》，內容規定大多數漢人兒童就讀「公學校」，僅有日籍學生與少數社會上層的台籍學生，能就讀教育資源較為豐富的「小學校」。由於家庭經濟無後顧之憂，蘇新優越的學業表現，讓他於 1922 年考上台南師範學校，但也就在同一年，總督府第二次發布《台灣教育令》，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各地民族自決風潮的影響，日本政府深恐台人效仿，要使台灣教育體系與日本內地一體化，除初等教育外，中學以上學校施行日、台學生共學，並停止使用「內地人」、「本島人」等差別性的稱呼，²⁴但原本專供臺灣人就讀的中學湧入更多日本人後，反而造成臺灣人中學以上就學率降低。

同樣原本只有單純招收台灣學生的台南師範學校，因為新教育令的規定而一

²²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37。

²³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37。

²⁴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頁 208-210。

同招收日籍學生，但這造成了臺、日籍學生間民族衝突問題日形嚴重，因為整體教育福利與待遇皆偏頗於日人，且在飽受日人民族優越感的歧視下，普遍引起台籍學生的不滿，蘇新就在這一年深刻感受到日本人的民族歧視：

由於日人老師歧視台人學生，常引起台人學生對教師不尊敬或反抗的事情。而這些事情的責任大多歸到我身上來，因為我是級長。有些日人學生甚至向教師反映這些事情都是我煽動的等等。從這個時候起，就開始痛恨日人學生的「民族優越感」和日人教師對台人學生的「民族歧視」。²⁵

在蘇新意識到台、日人間民族差異與歧視的同時，1922年的台灣正處於社會改革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鑒於日治前期諸多武裝抗日行動的失敗後，許多有志於改革臺灣人二等公民處境的台籍知識菁英，著眼於和平形式的政治、社會改革運動，將一次大戰結束後，盛行於全球的民主政治、自由主義與民族自決思潮傳播至台灣各地，讓包括蘇新在內的眾多臺籍學生意識到自身的民族處境，而能明顯感受建構在對於台人民族歧視上的日本民族優越感。但事實上，蘇新在學校教育過程中，所感受到教育政策上的民族不公，以及上一節所提到受到經濟剝削的農民階級，都僅是日本殖民地政策下的一部分受害者，若從整體殖民政策來觀察，台灣人民面對的，是橫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心理層面的民族歧視與剝削，蘇新的感受就如同大多數的臺灣人民一般，並非特定產業、階級或是個別案例而已。

在政治層面，由於「六三法」賦予臺灣總督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權於一身，十足的集權專制下，台灣人民不僅沒有現代民主國家公民擁有的參政權，連基本人權都難以完善，如為人所詬病的保甲條例、匪徒刑罰令、罰金與笞刑的施

²⁵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38。

行，都是以「六三法」為核心而延伸出，如此的嚴刑峻法普遍讓臺人心生不滿與羞辱。²⁶有鑑於臺灣人民所受到的政治不平等待遇，許多知識分子、鄉紳階級紛紛向台灣總督府請願，期望取消六三法與不平等的法律制度。

1918年，以林獻堂(1881-1956)為首領導一群東京留學生，組織「六三撤廢期成同盟會」，期望總督府能夠將台灣納入日本憲法治理下，保障台人基本人權，又於1921年，發起一系列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蔣渭水(1891-1931)、蔡培火(1889-1983)也在1923年組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爭取台人基本參政權與地方自治，²⁷雖然這些政治改革的訴求運動多以失敗告終，但政治運動層面的失敗僅是短暫的一時，文化思想的啓迪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影響其實更為深遠，其中又以「臺灣文化協會」的社會影響最為重大。

在一系列政治請願運動的推波助瀾下，由林獻堂、蔣渭水於1921年在台北創立「台灣文化協會」，是日治時代台籍人士最為龐大的政治、社會改革團體，成員以醫師、地主、律師、士紳及留學生為主的知識份子居多，協會創立目的在於推廣民主及民族自決理念，試圖以啓蒙教育喚起台灣大眾的民族意識。台灣文協以《台灣民報》做為宣傳工具，在全島各地廣設讀報社，並時常巡迴舉辦演講，成立書局、講習會及文化劇運動，以向人民傳播新知識、新思想。²⁸在台灣文化協會熱烈進行的文化推廣運動中，許多青年才俊皆紛紛參與並接觸到新思想，因而孕育出往後許多的社會改革與左傾思想先鋒，其中一位受到文協思想薰陶的青年，即是本論文的探討人物蘇新。²⁹

²⁶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191~192。

²⁷ 張炎憲，〈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研院三民所，1984年，頁271-272。

²⁸ 張炎憲，〈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頁278-282。

²⁹ 台灣共產黨的許多創黨成員，早年都曾參與過台灣文協的活動，如蘇新、謝雪紅、林木順、蔡孝乾(1908-1982)、王萬得(1903-1985)等人。

蘇新政治思想與民族概念的啓蒙，最早即是緣於1923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開始，在台灣文化協會熱烈進行的諸多文化推廣運動中，他接觸到了日式教育所刻意忽略的西方意識形態、歷史人文知識，且蘇新正值民族仇恨萌芽的少年階段，文協啓蒙運動對他往後的政治生涯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在其晚年回憶錄中也說到了文化協會對他的影響力：

當時台灣已有一個群眾團體「台灣文化協會」，到處開講演會，進行啟蒙運動。台南也有該會的支部，常有什麼講演會或座談會，無意識中我就成為一個熱心的聽眾。因受了這些刺激和影響，就開始思考「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統治台灣」和「台灣人民的前途」等問題。這可以說是我的「民族意識」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萌芽」。

30

1923年，蘇新加入台灣文化協會時才16歲，是當時年紀最小的成員，跟著講習會的老師學習英文、政治、歷史等人文知識，也讓他開始思索台灣人民的民族前途，當然受到影響的不只是蘇新一個人，文化協會對於台籍青年的啓蒙教育，燃起了他們的民族意識與反抗思潮，且又正值血氣方剛的少年時代，因此，自從新教育令的頒布實施後，台、日籍學生共學的學校頻頻傳出衝突，甚至引發學潮，³¹蘇新也一如眾多反抗不公的台籍青年們，將思想轉化為具體的反抗行動。在蘇新加入文化協會的隔年1924年，台南師範學校舉辦一年一度的校內運動會，校方安排學生家長座位時，仍然存有民族差別待遇，僅日籍學生家長有看台與座位，台籍學生家長則無，此一舉動更是觸怒台籍學生的敏感情緒，就在運動會前一個晚上，蘇新夥同數位同學將農場排泄物潑灑在看台座位上，因而被學校勒令退學。³²

³⁰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38。

³¹ 葉芸芸，〈蘇新與日據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34。

³² 葉芸芸，〈蘇新與日據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35。

在當時學潮中被退學的各校台籍青年，大多轉往國外繼續學業，以日本留學生為數最多，被退學後的蘇新，由於叔父們負擔不起到日本留學的費用，最後在舅舅的支持下，1924年底和台南師範學校被退學同學們前往日本留學。³³ 1925年4月考入東京大成中學，並且對於未來的志向已有初步雛形：

當時的志願是想將來讀大學文學系，當新聞記者或文學家。認為，當新聞記者比較自由，不會受壓迫，又可以寫文章作啟蒙運動，教育台灣人民。所以，進學校以後主要努力學日語和英文。³⁴

在日本讀書的蘇新，已經意識到文字力量及大眾媒體的重要性，因而立志成為新聞工作者，隔年1927年，也順利考進東京外國語學校英文系，並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加入「東京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類似學生讀書會的社團，³⁵蘇新也在這段時間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

當時，日本先進的人們開始翻譯和寫作大量的進步書籍，這使我的視野開闊了。於是，很快地便參加了日本的學生運動，並成為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³⁶

因為閱讀左翼書籍而與日共學生運動幹部結識，受到他們的影響，蘇新的思想和行動也逐漸激進。同年7月，臺灣文化協會負責人王敏川（1889-1942），到東京發行台灣《大眾時報》，聘請蘇新做該報主編，由於台灣文協在1927年的左右路線鬥爭後，雖然左派成功奪取權力，但其機關報《臺灣民報》仍掌握在右派手中，漲權的左派欲發行新報，卻屢遭台灣總督府的禁止，因而打算在日本創辦

³³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39。

³⁴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39。

³⁵ 葉芸芸，〈蘇新與日據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37。

³⁶ 陳國雄，〈為祖國統一奮鬥半個多世紀的人-訪問全國政協委員、台灣省籍知名人士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333。

然後引進台灣。³⁷時年僅21歲的蘇新即擔「文協」機關刊物《大眾時報》主編，同時又繼續擔任學生運動組織之工作，在多重任務的沉重負擔下，學業也就荒廢而遭學校退學。³⁸

到了1928年，是蘇新投入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轉捩點，從原本赴日求學，轉變為完全的政治革命運動者，蘇新對當時準備加入台灣共產黨的過程有簡單的描述：

一九二七年年底，日本《無產者新聞》(當時日共公開的機關報)的編輯門屋口博給我介紹一個台灣同志，說它是從中國來的，要見我。他詢問了一些有關「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和東京台灣人學生的情況之後，和我商量，選擇幾個比較積極的、水平較高的台灣同學，組織「馬克思主義小組」，準備參加「台灣共產黨」的建黨工作。³⁹

蘇新口中的那位台灣同志，即是台灣共產黨創始者之一的林木順，在林木順領導下組織「馬克思主義小組」，小組成員有來自其他學校的台灣學生陳來旺(?-1929)、林添進以及蘇新等人。1928年4月，林木順、陳來旺到上海參加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陳來旺於7、8月回東京，9月「馬克思主義小組」改組成爲「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直接接受日共中央領導，蘇新正式成爲台灣共產黨員。但蘇新加入台灣共產黨前，早於1928年2月就已成爲日本共產黨員，可是才歷經一個多月的時間，日共遭到大規模搜捕，蘇新失去爲時短暫的日共黨員身分，也因爲使用化名加入日共才得以倖免於難。⁴⁰蘇新加入台灣共產黨時，已失去了大眾時報主編一職，在同年7月，《大眾時報》屢屢受到日本當局

³⁷ 黃文源，《蘇新的革命道路——一位台共在東亞共產運動的矛盾與困境》，頁 37-41。

³⁸ 葉芸芸，〈蘇新與日據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41。

³⁹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41。

⁴⁰ 葉芸芸，〈蘇新與日據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41。

施壓而被迫停刊，同年年底又奉台共東京支部之命令返台從事工運，蘇新因此在1929年2月返回台灣，結束長達五年的留日生涯。⁴¹

綜觀蘇新早年生平的歷程來看，他的共產、民族主義思想，皆起源於動盪的大時代洪流中，從蘇新加入文協的1920年代，當時的台灣正受到一戰結束後的世界潮流影響，瀰漫相當濃厚的民族自治與左派運動氛圍，少年叛逆時期的蘇新不僅親身經歷了教育制度的不平等，更目睹了台灣民族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刻，加上留日期間受到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薰陶，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政治認知與民族認同，並展現於往後的政治旅途上。

第三節、台灣共產黨的興起與瓦解

自1917年10月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成功建立世界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後，他們便不曾停止共產革命的腳步，於1919年建立第三國際，積極扶植世界各地的共黨組織，以期邁向世界革命。但在同一時間，資本主義陣營國家也展開了一系列的圍堵行動，從俄國內戰、德國革命、匈牙利革命到芬蘭革命戰爭，除了俄國內戰，蘇俄取得犧牲慘痛的勝利之外，共產革命的火苗大多被資本主義陣營所撲滅，在歐洲建立共產政權的目標一直沒有任何突破。⁴²亞洲共產革命運動的情況也跟歐洲相當類似，東北亞各國的共產黨皆在1920年代紛紛成立，如1921年蒙古人民黨、中國共產黨成立，1922年日本共產黨及1925年朝鮮共產黨的成立，它們皆受第三國際的東方國際局指導。⁴³

但亞洲的情況一如歐洲艱辛，除了1924年，蘇聯紅軍協助蒙古人民黨推翻君主政權外，其餘國家的共黨組織仍過於薄弱，短時間內無法奪取國家政權，世界

⁴¹ 葉芸芸，〈蘇新與日據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142。

⁴² 霍布思邦，《極端的年代》，臺北：麥田文化，1996年，頁92。

⁴³ 鄭學稼，《第三國際史》上冊，臺北：商務，1977年，頁629-636。

革命的腳步屢屢遭受打擊，看似難有達成之日，但左翼思想的潮流蔓延全球仍是不爭的事實，接受殖民統治的台灣也同樣受到了影響。由於日本在台的殖民體制，充斥了種種不平等的經濟、民族、教育及文化政策，除激起各式性質的武裝抗日行動外，也刺激了許多台籍知識菁英，從事和平形式的政治、社會改革運動，其中「台灣文化協會」是孕育往後台灣左翼運動的重要關鍵。

在台灣文化協會散播西方民主思想、科學新知及啓迪民智的過程中，一位來自彰化女工出身的謝雪紅(1901-1970)，因為受到文化協會的左傾思想影響，遂於1924年至1925年間，數次前往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上海一帶參與左翼活動，與其同行的是另一位也因文化協會活動而結識，來自台北師範學校的學生林木順(1904-?)，當時的上海反日罷工氣氛正濃厚，兩人於上海五卅慘案的反日表現亮眼，⁴⁴而受到俄共駐紮於上海的國際東方局矚目，因此安排兩人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系就讀，年底再分別將謝、林轉至莫斯科的東方大學與中山大學就讀，進行共產組織及精神訓練，1927年底兩人結束訓練準備返回上海，第三國際指示日本共產黨，準備輔助成立台灣共產黨事宜。⁴⁵

但就在謝雪紅籌備台灣共產黨的過程中，1928年3月，日本共產黨遭到日本警方全面查緝，數千成員遭到逮捕，組織瀕臨全面瓦解，因此，台灣共產黨的建立，大部份須由中國共產黨協助，但名義上卻又必須透過殘餘日共的管道來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如此多方勢力扶植下所組成的台灣共產黨，埋下了往後政治路線分歧的伏筆。⁴⁶就在蘇俄、中共、日共的多方扶持下，台灣共產黨於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的法國租界區成立。同時，原本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

⁴⁴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一間日本棉紗廠工人發動罷工，抗議日本資方不當開除及毆打工人，五月中旬，該廠工人代表顧正紅遭日人槍殺，五月三十日有學生二千餘人示威援助罷工工人，爾後租界區的英國巡捕向示威學生及群眾開槍射擊，造成數十人死傷，是為「五卅慘案」。

⁴⁵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臺北：草根文化，1998年，頁574。共產國際於1922年舉行第四屆代表大會時，針對亞洲策略通過「東方問題的綱領」，綱領的主要概念乃殖民地母國的各國共產黨，須扶持殖民地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

⁴⁶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臺北：麥田，2009年，頁55-59。

部東京特別支部成員，也一併歸入台灣共產黨，成員之一即是蘇新。

由於台共的組成是蘇、中、日共三方勢力下的共同產物，台灣共產黨成的組織目標與執行策略，其實在內部成員間多有爭論，但在謝雪紅的統領之下，政治方針與策略因而得以確立，從台共於創黨同年所提出的政治綱領，可得知其政治任務為何：

- 一、 打倒總督專制政治-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 二、 台灣民族獨立萬歲
- 三、 建立台灣共和國
- 四、 廢除壓制工農的惡法
- 五、 勞動七小時-不勞動者不得食
- 六、 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 七、 土地歸還農民
- 八、 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 九、 制定失業保險法
- 十、 反對壓制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 十一、擁護蘇維埃聯邦
- 十二、維護中國革命
- 十三、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⁴⁷

由上述十三項要點的台共綱領可以歸納出，台灣共產黨想要聯合工農階級打倒地主資產階級，達成階級、經濟平等的目標，同時，也要終結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專制，建立以台灣民族所組成的的台灣共和國。之所以台灣共產黨可以將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兩種政治目標本應不同的運動相結合，是因為日本人在台灣擁有

⁴⁷ 簡炯仁，《臺灣共產主義運動史》，臺北：前衛，1997年，頁191。

民族、階級兩種身分的重疊，一個少數的外來民族統治多數台灣人民，並占據政治、經濟的高層成為統治階級，不讓台灣人民享有自己勞動生產的資源。此時，對占社會群體多數的台灣民眾來說，日本人的民族與階級特徵同時重疊，台共革命所欲斬除的資產階級敵人，同時就是外來民族日本人所組成。換言之，若能推翻台灣總督府，驅離日本人離開台灣，也就等同於台灣島內資產階級的消滅，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目標因而得以合而為一，台共如此的政治主張，是相當順理成章且符合現實所需。

但理想終究不敵於現實，就在黨組織成立後不到十天的時間，早已掌握情資的日本警方與法國當局合作，對台灣共產黨進行搜捕，以謝雪紅為首的許多黨員皆遭到逮捕而押回台灣受審，唯獨林木順一人成功脫逃，組織一度瀕臨瓦解，後因日本警方掌握的罪證不足無法確認罪刑，謝雪紅等人陸續遭到釋放。在這次的大逮捕後，台灣共產黨也重新在謝雪紅領導下重整旗鼓，為重新整頓左翼勢力，謝採取聯合陣線的策略，⁴⁸廣泛與台灣島內其他的合法左派組織合作，其中以新文協與台灣農民組合與台共關係最為緊密，爾後更取得這兩個左傾組織的領導權。但到了 1929 年 2 月，日本警方針對逐漸左傾的台灣農民組合進行突擊逮捕，加上台共的數份宣傳刊物也屢屢遭到嚴密取締，聯合陣線策略的長期佈局又再次受到嚴重打擊。

鑒於島內左翼勢力節節敗退，留外的台共成員紛紛趕回島內支援，返台的人士大致分為留學日本學生與留學上海兩方成員，蘇新也在這時返回台灣，回台後所收到的指令是接觸第一線的勞工階級，而非發揮他文筆的專長，在前往台北向領導人謝雪紅報到後，隨即進入羅東太平山伐木場偽裝成工人，並秘密組織工會。但其身分很快遭到日本警方懷疑，蘇新趕在逮捕前夕即時逃離，又於 1929

⁴⁸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臺北：麥田，2009 年，頁 92-96。

年 10 月，轉往基隆礦區組織礦山工會，並建立基隆地區黨支部，⁴⁹但在勞動基層活動僅一年半的時間，蘇新很快就捲入台共內部的權力鬥爭。

從 1929 年留外的台共成員返台後，台灣共產黨的內部組成份子出現變化，最終也讓黨組織陷入分裂的危機，由於當年台共在上海租界地，由蘇、中、日共三方扶植成立，本是由日共為管道，居中傳達第三國際命令給台共，但日共於 1928 年遭到清剿後，台共能接觸第三國際的管道，就只剩總部位於上海的國際東方局與中國共產黨而已。起初在謝雪紅領導的聯合陣線方針下，台灣共產黨維持了短暫的自主性，但隨著時間推進而缺乏顯著政治成果的情形下，導致謝雪紅的領導方針遭遇到各式的反對聲浪，黨內部的歧異在 1930 年 10 月具有檢討性質的松山會議就顯露而出，並且出現了另外一個權力中心試圖取代謝雪紅的領導。

50

以留學上海大學的傾中少壯派為主要組成份子，有翁澤生、王萬得、陳德興 (1906~?) 與蘇新等人，由於不滿謝雪紅傾右的溫和聯合政策，放棄階級武力革命，以翁澤生為首展開權力架空的動作，翁在上海扮演台共與國際東方局的中間聯絡人，以代表共產國際的名義傳達命令給予謝雪紅，⁵¹雖然他傳達的命令是否真為共產國際所下達，在前人相關研究下仍有些許爭議。但很確定的，謝雪紅並不予理會，甚至認為翁澤生根本是假藉共產國際名義行奪權之實，⁵²1931 年 1 月少壯派成立黨內部的分派，是為「改革同盟」，成為台灣共產黨的新領導中心，又於同年 3 月召開台共第二次臨時大會，正式開除了謝雪紅、林木順、楊克煌等人的黨籍，重新任命中央委員，並制定新的政治綱領：

⁴⁹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136-137。

⁵⁰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136-137。

⁵¹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143-145。

⁵²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112-116。

- 一、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使台灣獨立
- 二、沒收帝國主義一切的企業及銀行
- 三、沒收地主的土地，分與貧農、中農使用
- 四、實行八小時勞動制，實行失業的國家救濟，實施社會保險
- 五、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累進稅
- 六、革命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自由
- 七、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 八、國內民族的一律平等
- 九、與日、華、印、韓的工農聯絡
- 十、與蘇維埃聯邦及世界無產階級聯絡⁵³

若比較台灣共產黨 1928 年與 1931 年兩次的政治綱領，可得知第二次綱領與第一次的政治綱領大部分並沒有什麼不同，土地均分與台灣獨立的目標都沒有改變，至於二次綱領的第七點則是聯合陣線策略與「改革同盟」最大的歧異，謝雪紅的聯合陣線，合作對象包涵台灣資本家與小資產階級以及任何左傾組織，是個具有政治包容性的共產主義。但在少壯派眼中，這是對右派妥協的機會主義，只要是非工農階級組成的政府都應以武力革命推翻，只能由工、農階級組成無產階級政府，實行共產社會制度，與資產階級間毫無任何合作的可能性，在政治意識形態光譜上，改革同盟的策略方針是絕對的極左，因而確立台灣共產黨走向激進武力革命路線。

但在改革同盟奪權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1931 年 6 月，日本警方再度對台灣共產黨全面查緝，在成員各自逃亡的情況下，日警整體逮捕行動從 6 月持續到 9 月才告一段落，共逮捕組織成員七十九名，其中有四十九位遭到判刑，重要

⁵³ 簡炯仁，〈臺灣共產主義運動史〉，頁 217。

幹部皆遭到判刑五至十多年不等的刑期，蘇新則遭重判十二年，⁵⁴日治時期的台灣左翼運動就在台共覆滅後，幾乎全面宣告終結。蘇新自 1931 年 9 月被捕，至 1942 年 9 月出獄，共計十一年的牢獄歲月，出獄後則從政治革命要角，轉變為民間企業一員，到戰爭結束前三年，分別在台灣礦泉公司、佳里油脂公司、北門郡養兔組合、北門生鮮食料品統制組合等企業擔任文書職務，⁵⁵在這段時間中，蘇新的政治思想與活動受到日本警方嚴密監控而呈現停滯狀態，直到日本二次大戰戰敗，臺灣光復的到來，蘇新才得以再度展露對於政治的高度熱誠。



⁵⁴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168。

⁵⁵ 黃文源，《蘇新的革命道路——一位台共在東亞共產運動的矛盾與困境》，頁 170-171。

第二章、光復初期的政治動向

在日治時代走向武力革命路線的蘇新，光復後因為受到二二八事件，以及自身曾是共產黨員身分的影響，僅留在台灣近一年半的時間就流亡香港，再也沒回到家鄉過。雖然時間短暫，但卻也是本文最為著重的焦點，因台灣光復後，蘇新雖然不再擁有共產黨員的角色，其階級批判的精神似乎出現了變化，當時由外省族群組成的國民政府不僅施政全面失敗，更讓他們成為台灣百姓謾罵撻伐的對象，戰後從事新聞工作的蘇新，照理應嚴厲針砭當時經濟崩潰的時政，卻因為秉持著民族認同的情感，而迴避時人關心的經濟問題，又不時運用文筆維護政府官員，全然失去了階級批判的力道。因此，光復初期的蘇新，對於台籍、外省族群之間的省籍矛盾抱持著什麼樣的立場，就成為解釋政治態度轉折的重要關鍵，在探討這項轉折之前，勢必先對當時的時空背景做詳細的分析，以便與他當時的政論文章做出對比。

第一節、戰後台灣局勢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宣佈投降，臺灣再次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渾然不知情勢即將漸行惡化的臺灣人民仍歡天喜地期待王師的到來，憑藉的只是模糊不清的祖國印象，但經歷了半世紀的日治時期統治，台灣與中國之間早是分隔已久的兩個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實體，卻在一夕之間碰撞融合為一，其中帶來的危機與風險也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形明顯擴大。二次大戰甫結束之際，臺灣首要面臨的是糧食產量嚴重缺乏問題，許多農業設施在戰爭中遭到破壞，加上肥料缺乏，使的米糧產量在光復頭一年遠遠不及日據時代的高峰。

表 2-1 二二八事件前十年台灣米糧生產概況

年度	種植面積 (公頃)	總產量 (公噸)	每公頃平均產量(公斤)
1938	625389	1402414	2242
1939	626131	1307391	2088
1940	638621	1128784	1768
1941	646927	1199006	1853
1942	616529	1171182	1900
1943	610051	1125804	1845
1944	600688	1068121	1778
1945	502018	638828	1273
1946	564016	894021	1585
1947	677557	999021	1474

資料來源：臺灣省糧食局(編)，臺灣糧食統計要覽，1949年，頁 2-3。

由表 2-1 可以得知，光復初期頭兩年的耕植面積與米糧產量呈現緩慢增加的趨勢，但就總產量與面積平均產量來說，卻遠遠不及日據時代，而經過量化的數據表格，並無法呈現當時臺灣民眾所面臨的險峻情勢，雖然台灣歷經政權交替，但在糧食政策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仍延續了日治時代的糧食政策，設置糧食局，實施全面收購民間穀糧並全民配給的管制經濟，並於光復當年的 10 月 31 日公布「臺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但如此的作法卻在短短兩個月間失敗，一般大眾幾乎無法從政府手中得到足夠的糧食配給。

探究其中原因，是因政府收購價格過低(一公斤不到兩塊)及省籍衝突的文化因素，而造成農民普遍無意願繳納米糧，採取一種消極不合作的態度，⁵⁶但更為

⁵⁶ 顏清梅，〈光復初期臺灣米荒問題初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1)，臺北：中央研究院，1993年，頁 86。

關鍵的因素是，行政長官公署的徵收並非日治時代採行的強制手法，由於光復初期全臺軍警力量相當薄弱，並沒有足夠警力強制執行全面性的征收穀糧任務，由於受限政府預算短缺，與中國內陸的國共緊張局勢所逼，到 1946 年秋天，台灣全島各地的軍警力量大約只有一萬三千人，其中軍隊五千人，警察八千人，僅僅是日治時期台灣軍警總數的百分之六點四。⁵⁷ 另外，警政體系的人事分配也間接造成基層警察執行力低落，探究原因在於省籍族群的比例分配問題。

表 2-2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臺灣各警政機關的主管及其籍貫統計資料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各級主管人員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主管更動		
機關名	主管者	籍貫	主管者	籍貫	
臺灣省警務處	處長	胡福相	浙江	王民寧	臺灣
	副處長	揭錦標	浙江	劉戈青	福建
臺灣省警察訓練所所長	吳建中	安徽			
臺灣省警察大隊長	祝景華	浙江			
臺北市警察局長	陳松堅	江西	林士賢	臺灣	
高雄市警察局長	董葆昭	浙江			
臺中市警察局長	洪宇民	福建	陳錦廷	福建	
臺南市警察局長	陳懷讓	河北			
基隆市警察局長	郭紹文	浙江			
新竹市警察局長	陳鼎	浙江			
嘉義市警察局長	林天綱	浙江	林庚甲	臺灣	

⁵⁷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頁 118。之所以光復初期軍警總數僅佔日治時期的 6.4%，也須考量台灣過去是日本帝國的南進基地，兩個時代的軍警數目之間因而有巨大落差。

彰化市警察局長	王厚才	湖北		
屏東市警察局長	徐箕	浙江		
臺北縣警察局長	黃麗川	福建		
高雄縣警察局長	陳友欽	臺灣		
臺中縣警察局長	呂之亮	山西		
臺南縣警察局長	陸翰筱	浙江		
新竹縣警察局長	黃洵柳	浙江	方澄輝	福建
臺東縣警察局長	伍普星	廣東		
花蓮縣警察局長	王啓豐	廣東		
澎湖縣警察局長	許珩	江蘇		

資料來源：陳純瑩，〈光復初期臺灣警政的接收與重建〉，《台灣光復初期歷史》，頁 45。

從表 2-2 資料可瞭解，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全臺共二十一個警政機關主管，僅有一個是台籍人士擔任，二二八事件後也僅增加三個臺機主管，外省族群的壓倒性比例依然沒有改變，如此人事分配政策上所造成的省籍不公，讓多以臺籍人士擔任的基層警察人員，呈現消極執行上級命令的情形。⁵⁸最後造成的後果，即是行政長官公署不但無法徵收到米糧，農民多將生產及庫存的米糧賣給出價較高的商人，就在商人把持穀糧的情形下，米價扶搖直上，地方米價漲至一公斤十塊以上者不為稀奇。⁵⁹行政效率的低落讓行政長官公署根本無法掌握流竄在市面上的糧食，全面配給制度因而宣告失敗。

鑒於全面配給制度的失敗，行政長官公署於 1946 年 1 月 11 日起，取消全面配給改成全面自由貿易，但在行政效率無法提升的前提下，如此的措施只是讓政府更無法從混亂的市場中得到實物，造成糧食更集中於囤積的商人及官員手中，

⁵⁸ 顏清梅，〈光復初期臺灣米荒問題初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1)，頁 86-87。

⁵⁹ 顏清梅，〈光復初期臺灣米荒問題初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1)，頁 88-89。

也離當初平均分配米糧給人民的目標更加遙遠，米糧價格更如脫韁野馬般在無法想像的高價間徘徊，從 1 月 11 日自由買賣起，臺灣全島的米價就沒有低過一公斤二十元過，甚至在 4~6 月間漲至二十五至三十元。⁶⁰

表 2-3 光復初期前四年台北市物價指數

	1945	1946	1947	1948
1 月		100	100	100
2 月		124	161	117
3 月		153	199	137
4 月		175	196	145
5 月		200	211	148
6 月		204	266	153
7 月		215	245	189
8 月	100	221	267	234
9 月	94	212	310	283
10 月	104	223	440	623
11 月	109	228	546	1246
12 月	130	249	608	1141

註：1945 年以 8 月物價指數為基期，1946 1947 1948 年皆以各年度 1 月為基期

資料來源：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頁 48-49。

從表 2-3 的數據來看，從 1946 年 1 月自由貿易政策開始，物價指數的漲幅便開始激增，1946 年 5 月的物價指數，就已經是同年 1 月的兩倍，往後的物價指數更一路飆升不曾減緩，到了 1948 年 12 月，物價指數更是當年 1 月的十一倍

⁶⁰ 顏清梅，〈光復初期臺灣米荒問題初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1)，頁 91。

之多。除了糧食缺乏與物價高漲的問題，造成政府與民眾間的高度緊張外，政府人事問題的處置更是讓民生、階級問題轉變成民族衝突的濫觴，如同前述警察人事分配不公的問題一般。自從國民政府於 1945 年 8 月確定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皆由陳儀擔任首長，不僅擁有行政權又掌有軍事權，因此曾被詬病為台灣總督府的延續。⁶¹同時，臺灣島上的行政人事佈署問題很快就成為著眼解決的重點，由於二次大戰過後，中國大陸上仍急需重建，但政府預算短缺，人員相同的也面臨嚴重不足的困境，如此的窘迫局勢也進而影響到臺灣的行政運作，行政體系不僅難以順利維繫運作，效率及縝密程度同樣遠不及日治時代。

1945 年光復前夕，日本在臺灣的行政公務人員共有八萬四千五百五十九名，台籍人士佔了四萬六千九百五十五人，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六，但由於上述論及的戰後經費匱乏的局勢所迫，新成立的台灣政府在體制上遭大幅的裁減，公務人員總數也大幅縮減，⁶²到了 1946 年 10 月，也就是大約光復後的一年，公務人員裁減至四萬四千四百五十一人，只有日治時期總數的一半，但被裁撤的公職人員卻多是台籍人士，台籍人士在公務人員體系中的比例從原本的百分之五十六，在一年之間遽降至百分之二十二，也就是將近三萬四千人失去了工作，外省籍人士則佔公務人員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二萬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日籍人士也從過去的百分之四十四遽降至百分之十四(六千二百六十六人)，若以當時台灣每戶的平均人數七個人來算，臺籍公務人員失去工作的影響人數逼近二十五萬人(當時全台人口約六百萬人)。⁶³

除了基層公務體系的族群比例不公問題，高層公務體系的族群比例差距更為驚人，以 1946 年台灣長官公署簡、薦任公務人員省籍任用比率的數據來看，簡

⁶¹ 陳儀深，〈論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2 年，頁 42。

⁶²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頁 118。

⁶³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頁 118。

任官共有二百一十四人，薦任官共一千七百零四人，其中外省籍簡任官共二百零二人，薦任官一千三百八十五人，所佔比率分別約為百分之九十四與八十一，而本省籍簡任官僅十二人，薦任官三百一十九人，所佔比率僅約百分之五與十八。⁶⁴ 另外，行政公署在指派縣、市、鎮長，外省人士比例也相當高，如八位縣長中僅有兩位台籍人士擔任。⁶⁵

在光復將近一年的人事佈局中可以看到，各式種類的公務體系官員，外省族群比例皆占壓倒性絕對多數，相對的，台籍公職人員數量比例大幅減少，這引發了兩大族群間嚴重的緊張氣氛，甚至可說是轉變成族群衝突的導火線，此外在1946年這個時間點上，臺灣大眾民意除了對於人事問題的摩擦衝突外，及糧食臨時辦法的政策失敗，大眾輿論對於外省族群開始懷抱著敵意，且隨著時間進展而越形強烈，諸如「狗去豬來」、「五子登科」、「慘民主義」等等，如此在臺人間耳語流傳的諷刺及攻擊性字眼，也在報章媒體上隨處可見。⁶⁶

但綜觀來看，人事、米糧問題所導致的民怨，部份也需歸因於新聞自由的過度氾濫，由於陳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標榜三民主義學說，認為民主、自由化是建設新臺灣的最終目標，所以在地方選舉與新聞自由上給予臺人相當的發展空間，報業發表的文章、言論幾乎可不受檢查，⁶⁷從1945年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夕的一年半間，是台灣有史以來少見的新聞自由高峰時期，但高度自由的新聞政策卻也導致政府公信力的全然崩潰，由於當時的報業媒體將政府的行政疏失、官員貪汙及攀親附勢、經濟情況惡化等等，皆毫無隱瞞的完全報導，就以1946年1月為例，平均每兩天就有一件貪汙案出現在當時的報紙上，⁶⁸又受到1946年中國不穩定的局勢，臺灣物資事實上不斷在檯面下流往中國，社會輿論也都從

⁶⁴ 楊亮功、何漢文，〈調查「二二八」事件報告〉，《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320-321。

⁶⁵ 陳儀深，〈論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2。

⁶⁶ 李筱峯，〈二二八事件前的文化衝突〉，《思與言》第二十九卷第四期，1991年，頁213-214。

⁶⁷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頁132。

⁶⁸ 李筱峯，〈二二八事件前的文化衝突〉，《思與言》第二十九卷第四期，頁205-206。

報紙上不斷得到如此的訊息，從 1946 年 1 月至 1947 年 1 月，共查獲稻米走私案件 47 件、囤積米糧 13 件，也幾乎毫不保留的刊載於報紙上，⁶⁹當時的報紙對於政府的貪污、瀆職事件報導可謂家常便飯，讓臺灣人深刻體會國民政府的極度腐敗，對於政府外省族群的敵意更是透過大眾媒體強烈激化。

第二節、蘇新的政治批判與動向

面對日本異族政權的離去，光復初期的蘇新一如當時臺人普遍抱持樂觀情緒，對於新時代的來臨充滿著期待與冀望，積極參與各式的社會組織與活動，但與日治時期不同的是，他從激進的左翼運動者，轉變成批判時政的新聞工作人，先後擔任《政經報》、《人民導報》、《中外日報》、《臺灣文化》的主編，⁷⁰並也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了多篇評判時事的政論文章，在這些對於給予政府建言、批評的文章中，能夠看到蘇新的階級意識展現，頻頻為人民發聲，如針對當時政府人事布局與日益嚴重的缺糧問題予以評論，並不因過去的政治受難歷程與角色的轉換而放棄關心政治。

但本文所關注的重點聚焦在蘇新此時的政治立場轉折，由於過去長達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由少數的外來民族盤據了國家機器與資源成為統治階級，以台灣共產黨的立場來看，當時民族與階級的敵人是一致的，推翻統治階級也等於驅逐異族政權，但現在異族政權已離開台灣，而台灣並未獨立建國，卻是由一個蘇新從未接觸過的「祖國」所接手統治，這個祖國對蘇新來說，僅是祖母口中說過祖先的家鄉，同樣也是由「祖國人」接掌國家政治、經濟資源成為統治階級，這時的蘇新是以何種角度看待祖國接收台灣，不僅相當值得觀察，也會帶來更多種

⁶⁹ 顏清梅，〈光復初期臺灣米荒問題初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1)，頁 95。

⁷⁰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172。

種的疑問。倘若蘇新視祖國也跟日本人一樣是外來民族，此時民族與階級的敵人又一如日治時代再度合一，而光復初期的經濟慘況肯定讓蘇新在媒體上大有批判的空間，甚至走向過去階級、民族革命的極端路線？亦或，蘇新認為外省族群也是台灣人民的血緣同胞，並認同其統治正當性，而將經濟問題歸咎在於資產階級或其它原因之上？

因此，為了釐清蘇新於光復初期的民族認同，他在光復頭兩年所寫的數篇政論文章，即為相當重要的史料，但相當可惜的是，前人研究卻在這個部分較為模糊不清甚至出現矛盾，陳芳明先生認為，以蘇新在二二八前夕所發表的兩篇政論文章〈紙荒〉、〈農村自衛隊〉，皆以批判物價飆漲造成經濟動盪，因而認定蘇新在光復初期扮演著階級批判角色：

文章雖短，反映出社會的動盪則相當鉅大。在這段紛亂的期間，蘇新已在醞釀起義抗暴的行動……無論如何，做為文人的蘇新，對當時的政治已徹底絕望了。他之走向武裝抗暴，實在是基於時代的要求。⁷¹

但事實上並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蘇新在光復初期有任何參與武力革命的跡象，且陳芳明又在上文的同一個章節中，認定蘇新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模糊難辨，前後文似乎有所矛盾：

蘇新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現在已難以辨識。⁷²

另外，在黃文源的《蘇新的革命道路——一位台共在東亞共產運動的矛盾與

⁷¹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177。

⁷²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181。

困境》一文中，也肯定蘇新光復初期的階級批判角色，其中引述了蘇新晚年回憶錄談及光復初期的新聞編輯工作，對他政治思想所造成的影響：

蘇新提到：「到《人民導報》以後，我的思想就開始轉變。」為何蘇新到《人民導報》之後思想就開始轉變，他認為原因：「第一，參加《人民導報》的這些人，大多比較進步，由他們那裡聽了不少關於大陸上的情況，特別是『國共合作』的性質和內容。同時國民黨的真面目已逐漸暴露，增加了對國民黨的認識。第二，看到一些進步報刊，如《民主》、《周報》、《文萃》、《新華日報》等，從這些報刊得到了不少新知識。」蘇新思想的轉變反應在編輯方向上，《人民導報》刊登的文章，大都採用反對國民黨的稿件。⁷³

雖然蘇新從業的報社，多刊載批判國民政府的報導文章，但就以蘇新擔任這些報社的編輯，而推論其政治態度的轉變，兩者之間的關聯似乎過於牽強，縱然報社的意識形態偏向批判政府，但是實在難以運用現有資料去斷定，哪些報紙的報導是由蘇新核准採用，況且，這段晚年的回憶是否有事後自圓其說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此要判斷蘇新的民族認同是否影響階級精神的唯一辦法，只有從他自身所寫的政論文章著手，而這也是前人研究中較少著墨的部分。

但若初步分析這些政論文章的內容，即可輕易發現，蘇新並不批判當時的統治階級，也就是國民政府當局及外省族群官員，反倒是一直歸咎留台日籍官員與台籍仕紳阻礙臺灣的發展，甚至在往後臺灣民意逐漸敵視外省族群的當下，不斷對政府與外省族群做出了維護、緩頰的言詞，比較起蘇新在日治時代的武力抗日路線，呈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及立場。為探究蘇新政治立場的矛盾現象是如何出現，本文將以蘇新於光復後的五篇政論文章作為討論焦點，試圖釐清他的民族

⁷³ 黃文源，《蘇新的革命道路——一位台共在東亞共產運動的矛盾與困境》，頁 113。

認同情懷是否勝過自身的階級批判。

蘇新於光復初期發表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是於 1945 年 11 月 25 日刊載於《政經報》的〈論人事問題〉，蘇新在文章開頭提到自 1945 年 8 月中光復以來數個月間，聽到大眾輿論對於行政長官公署的人事任用感到不滿，因為自 10 月 5 日在台北正式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後，政府仍繼續沿用在日治時代的台、日裔官員，這讓民意從期待轉為失望，蘇新認為不符合廣大群眾的期許，⁷⁴為達下情上達、喚起輿論的言論人任務，他舉出民眾不喜歡政府人事安排的十一項理由，但這十一項理由都是針對留台日人與台籍仕紳而來，其中五點集中抨擊日本人，另外六點則攻擊台籍仕紳：

最近跟著接收工作的進展，地方的御用紳士，也都登場起來了。有的做什麼代理郡守，有的做什麼代理街長。但是，若檢討他們過去的經歷，大部分是與日本官憲結托而剝削農民，或與日軍部結托，企圖隱藏軍用品而獲得巨利的所謂腐敗份子，連一點民族良心也沒有的漢奸……然而我們的政府反卻舉用他們。⁷⁵

蘇新認為所有曾與日本政權合作過的台籍仕紳，都是違反民族精神的漢奸，根本不應再任用他們為官，更甚的，很多都是壓迫左翼運動的特務警政人員：

臺灣人警察能做到高等特務，巡查部長，警部補，警部的人，大部分都是壓迫我們的革命先烈-例如文化協會，工會，農民組合，民眾黨，共產黨等的革命鬥士-和祖國的同胞(所謂華僑兄弟)很有功勞的……我們的政府又再舉用他們，對於這點，我們怎能心服？⁷⁶

⁷⁴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93 年，頁 153。

⁷⁵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55。

⁷⁶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54。

從上述兩段文字中可以看到，蘇新聽聞的民意多認為台籍官員多是在日據時代壓榨、殺害自家人的奸黨份子，若再度舉用他們不僅不合常理也無法服眾，同樣的道理也套用在留台日人身上：

官吏-尤其是警官是日本帝國主義彈壓並屠殺民眾的走狗和劊子手。日本帝國主義為著要達成它的經濟榨取的目的，便去養成和訓練適合於這種目的的官吏（民眾叫它狗官或臭狗）。在過去五十年間，臺胞遭受這種狗官吸去的膏血，不可勝計的……假使忽視這種歷史的事實，而硬要留用這種狗官的話，不但民眾要反對，而且簡直也對不起我們的革命先烈。⁷⁷

在光復後，日人高級官員、技術人員因為掌有技術緣故而必須留下，⁷⁸許多台籍人士也因為如此而留在原本崗位上，但看在蘇新眼裡，皆同樣應給予嚴厲譴責，認為他們都是魚肉鄉民、生吞活剝的貪官汙吏，甚至以國民政府的新生活運動為標準，為糾正社會風氣應不得再留用日人：

日本官吏已經腐敗不堪，與前清末期的貪官汙吏是不分上下的。日本前首相東久邇宮也曾經指出說：『戰敗的原因是軍部和官吏結托公然做不正買賣來賺錢，人民也偷做不正的買賣賺錢云云』，所以從新生活運動的眼光看來，為要使這種不正的政治風氣和社會風氣面目一新起見，也是不可留用的。若是留用他，就好像叫一隻偷吃肉慣了的狗去看守雞舍一樣的。⁷⁹

⁷⁷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53。

⁷⁸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文化，1993年，頁 118。

⁷⁹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55。

蘇新認為這些意見不是出於私人情感，而是政治中立的公正立場，並且提出了徵選人才的辦法，既然日本人、臺籍漢奸不可舉用，他認為可從社會中尋求人才，因為中等學校以上畢業者很多，人才絕對不乏，應依據五權憲法設立一個公平的考試制度，讓有為國家服務的熱誠人士可以發揮能力，以排除可能不公的私人推薦，也可從外省籍兵士中選拔適任的人才擔任警察、教職員，以及招募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招募志願兵來擔任本島警備工作。另外，蘇新也建議仿效韓國的人事考察局，讓人民有權利調查現存於政府體系中的前朝官員在過去是否有不法行為，若查獲就可予以罷免。⁸⁰

在〈論人事問題〉一文刊登大約兩個月後，蘇新的第二、三篇文章皆於 1946 年 1 月 10 日刊載於《政經報》，分別是〈再論「糧食問題」〉、〈主義·機構·人物〉，〈再論「糧食問題」〉一文探討的是行政長官公署的糧食政策，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在接收台灣後，沿用了日據時代的許多行政系統、管理辦法，在糧食方面設立糧食局專門管理糧食，一如日本治台時期的政策實施全民配給，⁸¹並於 1945 年 10 月 31 日公布〈臺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但臨時辦法〉，但臨時辦法卻在數個月之間很快失敗，大部分的民眾無法從政府手中得到足夠溫飽的米糧配給，且黑市的米價高漲，從採取臨時辦法前的一公斤三、四元，升至一公斤高達十元甚至更高，⁸²面對國民政府的政策失敗，蘇新便發表此篇文章透露自己的看法與解決之道，以下是蘇新認為臨時辦法失敗的原因：

我們大家都期待我們真正的「父母官」來，一定會施行良好的政策，來芟除我們的痛苦；但是現實與期待相反了，我們的「父母官」竟不徵求他的人民的意見，反聽了一部份日人陰謀家的話，上了他們的當，繼續萬人怨嗟的日本式的管理方針。使一般老百姓，有的

⁸⁰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56-157。

⁸¹ 顏清梅，〈光復初期臺灣米荒問題初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1)，頁 85。

⁸² 顏清梅，〈光復初期臺灣米荒問題初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1)，頁 87。

嘆息說「新的也是一樣！」而一部份的日人卻暗中鼓掌說「上我們的當了！」⁸³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光復不到半年的時間內，臺灣民眾似乎對於國民政府已出現反彈聲浪，蘇新因而替政府做出緩頰，他認為之所以國民政府會民怨四起、施政失敗，是因為留台日人的從中作梗，讓國民政府無法順利施政、人民生活更好，都是日本人進行的陰謀，蘇新告誡民眾要對日本人提高警覺：

筆者欲對當局諸公建言一句，就是要採用日官吏的意見的時候，需要十分警戒；千萬不可因要利用日官吏的行政技術，反上了他們的當。他們的所謂「行政技術」不過是一種「邪術」，是帝國主義者壓迫民眾的「技能」，絕不能適用於我們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雖然日人官吏中間，還有很好的，有良心的民主主義者，但是這樣的人很少；所以留用日籍官吏的時候，還要十分選擇。⁸⁴

蘇新呼籲廢除臨時辦法，採取自由經濟的法則調節高漲的米價，如不廢除臨時辦法，地方圈將會阻止米的流出，米的供給將短少，若真是不廢除，那就應該提高徵收價格，讓農民增高被徵收的意願，另外，蘇新也提到因為米糧的絕對生產量仍嫌不足，可以計畫輸入外米或增產代用食品，如甘藷。⁸⁵ 另一篇〈主義·機構·人物〉則針對當時民意對於外省官員的批評作出評論，認為大部分臺人因為些許的官員貪腐而誤解了整個外省族群、政府、三民主義：

但是現在呢，只因多數可敬的外省人中間，混雜著些不良份子，到處招搖撞騙，欺壓良民；有些官僚主義者流，到處拉攏人事，非親

⁸³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60。

⁸⁴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62。

⁸⁵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61-162。

不用；有些半官半商之輩，到處圖謀事業，奪取民營等等，致使一般省民嘲笑地說：「趕出一隻狗，牽入一隻豬」，宛然把外省人當做「豬」款待；諷刺「三民主義」為「慘民主義」或「三面取利」；把各地行政機關當做「商行」-這是何等侮辱我們的政府，何等冒瀆我們的國父！⁸⁶

蘇新強調在外省族群中，有許多害群之馬破壞了名聲，讓外省族群遭受到不公平的嘲諷，並且極力捍衛三民主義與國父的聲譽，蘇新呼籲民眾要搞清楚批評的對象並不是政府與三民主義：

不論本省人外省人，我們對於不良份子或官僚主義者或假官為商之輩，固要批評，要警戒，要排斥；但是不可以一人類萬人，不可只因一人不好，就罵透過全部；不可只因「人物」不好，就罵透過「政府」和「主義」。⁸⁷

蘇新強調人民批評三民主義前，要徹底了解三民主義而不可一知半解，當官員做錯事時，人民也不需要怒罵他們為豬、狗，因為官員可被監視，甚至可趕走的，並奉勸人民不分省籍族群，皆須信奉三民主義，口說、行為皆須與三民主義一致，讓大眾對政府、三民主義詆毀、唾棄的人，都是少數貪官、奸商導致。⁸⁸

到了米價近乎失控的 1946 年，國共兩黨關係漸趨緊張，蘇新也因為過去的台共幹部身份而遭到行政長官公署關切，為不再引起國民黨的注意，因此整個 1946 年並未再發表任何政論性文章，直到 1947 年初，以匿名方式再度發表了〈農

⁸⁶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63-164。

⁸⁷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64。

⁸⁸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65。

村自衛隊〉、〈紙荒〉兩篇文章。⁸⁹〈農村自衛隊〉於 1947 年 2 月 5 日刊載，內文以虛構的平田村（礙於國民政府的輿論監視）與叔叔之間的對話做為文章主軸，開頭提及蘇新叔叔寄信叫他回老家一趟，但在回到平田村後，蘇新才發現受到經濟崩潰、物價飛漲的影響，叔叔家中狀況相當糟糕，不僅糧食缺乏造成家中成員營養不良，更因醫療資源不足，家中兩個小孩染上天花去世，加上治安惡化、盜匪橫生，村中壯丁組成了地方治安巡守隊維持秩序。⁹⁰

另外，〈紙荒〉一文發表於 1947 年 3 月 1 日，剛好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隔日刊登，由於蘇新從事媒體工作，而新聞工作者最不可或缺的工具就是紙張，物價飆漲的程度竟連紙張都出現短缺，蘇新乃寫下此文痛訴：

這一個月來，經濟界的變動可說是破天荒的。僅在一個月之間，金自一兩萬六漲至六萬，米一斤十八漲至三十五，木炭百斤一百五十漲至四百五十，其他物價大都漲二倍乃至五倍，這種狂漲，誰都料想不到的，致使一般民眾為著生活將要發狂了。⁹¹

這是蘇新第一次正面痛批物價飆漲問題，但由前表 2-3 所呈現的光復初期物價指數來看，物價並非到了 1947 年才飆漲，早在 1946 年初就已經開始，除了一般民生日用品外，蘇新更強調紙對文化、教育的衝擊：

在這一般物價狂漲當中，最苦悶的是出版界。出版物最主要的因素是紙，而紙在這一個月間，約漲三倍，且日日上跳，不知所止……假使一二個月內倘不能補充的時候，本省的一切報館可準備關門了，一切印刷業者也可準備轉業了。印刷廠停了，對於學校教育和

⁸⁹ 分別刊載於《台灣文化》雜誌第二卷二、三期。

⁹⁰ 蘇新，〈農村自衛隊〉，《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77-182。

⁹¹ 蘇新，〈紙荒〉，《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83。

其他文化事業的影響，是不堪設想的，紙荒是文化破壞的前兆！⁹²

最後，本節將簡單探討蘇新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政治動向為何，前述已討論過陳芳明曾描述此時蘇新扮演何種角色是難以辨識，但透過蘇新本身的自傳與相關人士的回憶，仍可得知他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政治活動幾乎趨於消極被動，甚至抱持觀望的態度：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所謂「二二八事變」發生了，起初一、二天，我很慎重，不敢亂動，實際上也不知道如何動法，因為我沒有參加組織，也沒有參加任何群眾團體，有的只是「文化協進會」，這個會又是一些上層知識分子的集團，要動也無法動起。《自由報》已經停刊，無法發揮作用。因此我就在家裡看書。⁹³

如蘇新的回憶屬實，在臺北已經出現民眾動亂的同時，他則是選擇了觀望時局的態度，另外，時任《中外日報》編輯的周夢江(1922-2012)，在其〈二二八中和蘇新相處的日子〉一文，更是詳細透露了1947年3月初蘇新的動向：

就在這天晚上，我接到陳本江的電話：「林宗賢派蘇新於明天上午到編輯部，請你協助他工作」……第二天上午，蘇新先生挾個袱蓋捲來了。我和他過去有點認識，當時他在台北編輯一個刊物，同事周傳枝君曾帶我去看過他。當下我將蘇新安排在自己房間，一道吃住。彼此商定先出八開的《中外日報》臨時版。⁹⁴

⁹² 蘇新，〈紙荒〉，《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183。

⁹³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69。

⁹⁴ 周夢江，〈二二八中和蘇新相處的日子〉，《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202。

由於受到二二八事件影響，報社印刷工人罷工，內部編輯工作也呈現一片混亂，《中外日報》的發行因而停刊，蘇新受報社高層請託前來幫忙，兩人之間的對談可得知蘇新當時的想法：

當時我們談得最多的，是時局問題，即國民黨政府會如何對待「二二八」起義群眾。他分析了國內外形勢，認為當時內戰已開始，國民黨政府無力對台灣採取強硬政策，可能會作些小讓步。但是他又認為國民黨政府不會任令自己後院起火而置之不理，因為內戰中的軍糧大部分是由台灣供應的，所以也有可能派兵鎮壓。⁹⁵

由上述回憶可窺見蘇新對於國民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個人看法，可謂謹慎小心且不敢妄下定論，樂觀或悲觀的可能情形都已預先設想過，但從他在二二八事件後留在《中外日報》協助工作，仍可看出他對於時局仍是樂觀期盼，可是局勢演變卻發展到最不願見到的情形：

可是，就是這一天——三月八日晚上，傳來了國民黨軍隊在基隆登陸的消息。那天夜裏，編輯部宿舍附近槍聲不絕，我們兩人都沒有睡好，於是第二天編輯會議便決定暫延，由蘇新出去打聽消息……中午蘇先生回來，面色沉重，告訴我消息極壞。國民黨軍隊已在基隆登陸，殺了許多人，台北方面也有許多學生傷亡。⁹⁶

於是周夢江與蘇新便在當天討論未來的去向，兩人甚至考慮一同轉退台中，但蘇新又聽聞台中人民的反抗行動已破壞鐵路，對外交通中斷，兩人因而放棄這項想法，最後，蘇新思慮許久終於作出前往香港的決定：

⁹⁵ 周夢江，〈二二八中和蘇新相處的日子〉，《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03。

⁹⁶ 周夢江，〈二二八中和蘇新相處的日子〉，《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04。

這一天，我如坐愁城，不知如何是好。蘇先生倒相當鎮定，默默在考慮，桌上菸蒂積了一大堆。我以為他當天會離開編輯部，但當晚仍和我住在一起。他這時想到香港去，徵求我的意見。⁹⁷

但周夢江認為香港生活水準太高生活不易，而且不會講臺灣話，兩人共同逃亡過程將添增困難，因而決定與蘇新分開行動，隔日三月九號，國府軍隊準備查封報社，周、蘇兩人便各自展開逃亡。⁹⁸從上述周夢江的回憶內容，大致勾勒出二二八事件後的將近一星期間，蘇新的行蹤以及他當時觀望時局的態度，並可得知蘇新也一如當代台籍鄉紳、知識份子對於國民政府殷切期盼，認為時局還有轉圜餘地，是可以透過陳情、協商及溝通來化解危機。

分析完蘇新在光復初期數篇政論文章後，可以得知蘇新文章中批判的對象始終不是國民政府或外省族群，而是留台日人與台籍仕紳，但就以蘇新在日治時代的激進武力革命角色來看，在光復後新聞自由相當寬大的環境下，以人民、階級角度在報紙上對於國民政府的行政疏失大書特書理應是一件相當平常的事，可是1946年初的兩篇文章，蘇新將米糧政策的失敗歸咎於日人身上，並在人事問題上，認定日籍官員、台籍仕紳官員是未來建設臺灣的阻礙，文章帶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的情緒，足以知悉蘇新對於日本的民族仇恨仍然還未消除。至於民意對於國民政府的不滿聲浪，蘇新反倒認為那是大眾的誤解，而明顯迴避批判政府官員，試圖對本省、外省人士間的族群衝突予以緩頰，寫出和緩兩大族群的言論，並為政府辯護，捍衛當局的治國意識形態-三民主義，全然不見對於政府、官員有任何抨擊、批判。

⁹⁷ 周夢江，〈二二八中和蘇新相處的日子〉，《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04。

⁹⁸ 周夢江，〈二二八中和蘇新相處的日子〉，《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04-205。

事實上，在 1946 年初的時間點上，不論人事或是米價的問題，民意早已將問題的矛頭指向外省族群領導的政府，從原本的憧憬期待轉變為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項層面的族群衝突。身為報人的蘇新，在新聞自由的環境下不可能不知曉民意的向背與強度，縱然在 1947 年初也發表了批判意味濃厚的〈農村自衛隊〉、〈紙荒〉，蘇新僅就當時鄰近崩潰邊緣的經濟狀況做出描述，並沒有說明問題的緣由與癥結為何，也沒有說出可能的解決之道及改變的建言，文中始終不見對於政府的直接正面批判，只用文字做出批評與嘲諷，甚至我們可以從相關人士的回憶錄得知蘇新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行蹤，是採取觀望的態度，比對起日治時期蘇新的激進武力革命路線，可明顯看出他放棄了階級革命的政治道路。

蘇新為何放棄了過去舊台共的階級革命精神，可能源於他對於中國的民族認同與情感使然，在這光復初期的數篇政論文章中，蘇新對於中國接收台灣與外省族群的憧憬、崇敬在他的文章中明顯展現而出，文章中不時展露「優秀」、「可敬」、「廉潔」的詞彙來形容外省官員、族群，並不時維護他們遭受民意的批評攻擊，若再比較起他形容日籍官員、臺籍仕紳的詞彙，如「奸黨」、「走狗」、「野蠻」、「劊子手」等等，兩相比較就可察覺蘇新的中國民族認同的情感似乎影響了他的階級批判態度。

第三節、武力革命的延續

由上述章節的分析可得知，蘇新因為自身對於外省族群的民族認同與情感，而忽視了人民對於政局的不滿，完全背離了日治時期的激進階級革命角色，為了解民族認同對於共產運動造成的影響，是否也在舊台共成員中普遍可見，蘇新政治立場的轉折並非特殊異例，勢必要將前台共組織成員在光復初期的動向加以比對，以得知類似的民族情感是否也在其他前台共成員身上出現，又他們是如何看待光復政局、省籍衝突。此小節將主要參考陳芳明先生《謝雪紅評傳》一書，並

以謝雪紅在光復初期的政治行動做為主軸探討，得以與蘇新作出比對。

自 1931 年臺灣共產黨遭到徹底清剿後，組織重要成員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翁澤生皆先後遭到逮捕入獄，除了一般黨員楊克培、楊克煌處十年以下刑期，較為重要的幹部則都處以十年以上⁹⁹，他們在獄中皆遭到極為殘虐的刑求，得以活著出獄的人，早已造成身體永久性傷害，運氣較差的，則熬不過牢獄歲月病死獄中，謝雪紅經歷了七年多的刑期而得到肺病，本來被認為沒有存活下去的可能，於 1939 年 4 月被日本獄方放了出來，但很快的身體康復，往後到戰爭結束，與楊克煌定居於台中市，在現今臺中火車站附近共同經營一間百貨店。¹⁰⁰但這段期間因為受到日本警方的嚴密監控，謝、楊完全脫離任何政治活動，但謝雪紅的政治抱負並不因過去的牢獄之災而有所澆熄，反倒是乘勢而起開創新局。

1945 年 8 月戰爭結束，至行政長官公署 10 月成立，這兩個月的政治真空期，台人秩序普遍良好，全島各地都有「三青團」、「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等團體，台灣整體政治氛圍是充滿希望與樂觀的，但相較於台灣人對於國民政府的熱心期盼與幻想，謝雪紅對於陳儀政府的態度，就如日治時期舊台共左翼革命尚未結束一般的進行，早在戰爭結束的那一刻起，謝雪紅就已盤算重回左翼革命的準備，著手組織群眾，延續日治時期沒有完成的政治行動。同年 9 月 20 日，她在台中市第一女子中學校，成立「台灣人民協會籌備會」，與會者四十多人，組織成立目的號召群眾民主自治，如八小時工作制、人民自由權利的保障，並發行《人民公報》啓迪民智，謝雪紅並以人民協會作為基礎，另外組織「台灣人民總工會」與「台灣農民協會」，¹⁰¹一如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擁有周圍組織的策略一般，由此可見謝雪紅強烈的政治決心。

⁹⁹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178。

¹⁰⁰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184。

¹⁰¹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194-195。

之所以謝雪紅能夠有這麼強大的政治企圖心及先見之明，應歸因於她早年的政治經驗，早在謝雪紅莫斯科求學後至上海租界區，時值國共分裂時期，對於國民黨腐敗統治本質所造成人民的不滿，她早已有所見識，加上台灣共產黨滅亡的部分原因即是國民黨與西方國家合作，才得以讓日本警方在法國上海租界區逮捕台共黨人，這些殘酷的歷史片段似乎是謝雪紅一生難以抹滅的記憶，這解釋了光復初期她不僅對國民黨不抱持任何期望，甚至早在戰爭結束不到一個月，就連行政長官公署都還未成立以前，就著手展開左翼運動的重建工作，由此可以得知謝雪紅敏銳的政治自知與高度直覺。

謝雪紅再度展開左翼運動後，她一直住在胞弟謝真南所經營於台中公園對面的大華酒家(飯館)樓上，同時以大華酒家作為其政治活動的掩護基地，也是往後革命起義的辦公室與接待室。但隨著政治活動的進行，相關份子的來來去去，謝雪紅很快就被國民黨特務鎖定關切，而她憑藉著純熟的政治手腕，始終成功掩護檯面下的政治活動不受破壞，甚至為了贏取國民政府信任，而重新加入國民黨，以掩護自己的左翼戰線，據周夢江回憶，謝雪紅早在 1927 年就曾加入國民黨，1946 年又再度加入，與國民黨之間的表面關係維持良好。¹⁰²因此許多國民黨的重要人士、權貴官員也常光顧大華酒家與謝雪紅私交，從往後投入革命的「二七部隊」成員鍾逸人的回憶可得知謝雪紅熟練的交際手腕：

謝雪紅本人，這段時間也頗勤於交際權貴，憑她的閱歷、氣質風姿和語言天才，很多來自中國的權貴、國府官員，也都無不以親睹其風采、與她有交情為榮。¹⁰³

¹⁰²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222-223。

¹⁰³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 年，頁 457。

但就在謝雪紅與國府官員杯觥交錯的表面下，她運用媒體的影響力有效達成批判國民政府的標的，台中第一大報《和平日報》本屬於國民黨軍方，但謝雪紅拉攏內部多位記者，甚至派自己部屬滲透，如楊克煌即在《和平日報》內部擔任主筆，因而得以主導《和平日報》的編輯方針，對陳儀領導的國民政府做強烈抨擊：

我們所聘用的編輯記者校對和經理部的發行，幾乎都是謝雪紅介紹來的……這樣一來，報紙的言論和地方新聞也多少能反映臺灣人民的願望。《和平日報》台灣版在臺灣的局面漸漸打開，發行量迅速增加，日銷一萬多份，僅次於台北的《新生報》。可是在台灣當局看來，《和平日報》似乎「毒化」了。他們認為這是謝雪紅在操縱。¹⁰⁴

從前述謝雪紅、楊克煌等人的政治行動來看，雖然台灣共產黨早已於日治時期瓦解，但他們僅是沉潛以待時局變化，隨時準備重返革命道路，證明了舊台共成員的政治思想，可以不因組織的實存與否而改變，基於人民經濟、階級平等的理念，戰後重新集結了左翼勢力，聲勢規模皆不亞於日治時代的台灣共產黨，以茲對抗國民政府的腐敗統治。更令人注目的是，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謝、楊領導的左翼陣線，從紙上文筆一躍轉為實質的武力反抗，寫下台灣左翼運動史的輝煌一頁。

1947年2月27日發生緝煙當天，至3月1日間，全島各地都有零星的警民衝突，各地區民眾為了避免秩序失控，紛紛成立地方武裝力量以圖自保，並試圖解除政府武裝部隊的武力以免遭受其傷害，較具規模組織性的武裝團體，有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以謝雪紅所在的台中地區民眾來說，從2月28日下

¹⁰⁴ 周夢江，〈緬懷謝雪紅同志〉，《謝雪紅評傳》，頁199。

午，就能聽到從台北傳來的廣播，內容呼籲中南部人民聯合台北市民，集結打倒貪官汙吏，台中的仕紳階級、知識份子、各黨派團體成員以至庶民階級，無不感受恐懼氛圍，因而有地方武裝自衛的需求。¹⁰⁵

緝菸事件三天後的3月2日，台中、彰化一帶的仕紳階級，在與國民政府協商後仿照台北仕紳，在台中市議會成立了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並派遣代表參加台北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¹⁰⁶但也在當天，台中普羅階級市民與學生組成的市民大會，在台中戲院展開，謝雪紅、楊克煌等人也在這次的集會中發表演說，煽動了群眾情緒而走上街頭，楊克煌描述了起初的情況：

完全沒有人領導，也沒有人示意他們要往那裡去，而是群眾自己正確地找到了主要的打擊對象……這批群眾首先衝入三青團，把裡面的家具、設備全部搗毀了。我進去時，即看到掛在牆上的一幅蔣介石的大畫像已被人拉下來，撕得粉碎了，痛快！¹⁰⁷

就在短短的一天時間中，台中市民占領了台中火車站附近的警察局與專賣局，甚至包圍警備司令部高級參謀的前台中縣長劉存忠(1906-1991)家宅，準備放火焚燒，後在謝雪紅與群眾的協商下將之監禁，儼然成為群眾領導人的謝雪紅，又收到國民政府軍隊要進攻台中的消息，因而運用電台廣播中部地區人民起而反抗，楊克煌回憶如此記載：

謝雪紅又叫《中華日報》分社的一個記者去阻成一個小組到電台廣播，交代他要向台中地方的人民報告蔣匪軍要來進攻台中……並呼籲中部地方的人民起來進行鬥爭，佔領市、區、鎮、鄉的國民

¹⁰⁵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235-236。

¹⁰⁶ 楊克煌，《台魂淚（二）：我的回憶》，頁286。

¹⁰⁷ 楊克煌，《台魂淚（二）：我的回憶》，頁285。

黨政、軍、警、黨團的所有機關和派出武裝隊伍到台中來支援台中人民的武裝鬥爭。¹⁰⁸

最後雖然證明3月2日當天收到的情報是假的，但人民反抗的情勢似乎已經無法控制，3月3日謝、楊決定成立「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作戰本部」的成立使中部地區的零散武裝力量有了集結的中心，彰化、大甲、豐原、埔里、東勢、田中、太平等地的武裝自衛隊紛紛派出援軍支援，中部地區的治安情況也在作戰本部成立下情況有所控制，3月3日至4日兩天，「作戰本部」與國民黨軍隊在台中各地爆發了一系列的戰鬥，最後皆由作戰本部取得勝利，甚至國民政府軍在中部地區最大的空軍基地第三飛機場也棄械投降。¹⁰⁹到了3月5日，作戰本部與各地區的地方治安隊再被擴大為「二七部隊」，「二七部隊」暫時性的掌控台中地區治安直到11日，¹¹⁰而相當值得一提的是，謝雪紅自從加入二七部隊後，甚至有建立「人民政府」以實現台灣自治的企圖，不僅刻製好「人民政府」的印章，也開始撰寫「人民政府」的綱要，但引起二七部隊內部的反對意見而作罷。¹¹¹

到了3月9日，由蔣介石下令鎮壓臺灣的國民政府軍隊二十一師從基隆登陸，慘無人道的屠殺就此展開，同時也有部分軍隊調往台中鎮壓，消息也很快傳至謝雪紅等人的耳裡，經過數日的內部商議後，到了3月12日，謝雪紅與「二七部隊」撤退至埔里，而根據「二七部隊」指揮官古瑞雲(1925-)的回憶錄內容，¹¹²謝雪紅曾向霧社原著民尋求援助，但沒有獲得回應，並在「二七部隊」於三月十五日傍晚準備進軍日月潭時，古瑞雲目擊謝、楊兩人乘坐卡車離去，並未參與隔天

¹⁰⁸ 楊克煌，《台魂淚（二）：我的回憶》，頁292-293。

¹⁰⁹ 楊克煌，《台魂淚（二）：我的回憶》，頁299。

¹¹⁰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253。

¹¹¹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250。

¹¹² 古瑞雲(1925-)，轉入中共後改名為周明，1946年在謝雪紅的介紹下進入《中外日報》工作，二二八事件後參加「二七部隊」擔任鍾逸人副官，爾後和謝雪紅、楊克煌逃至香港又轉投中共。

的「烏牛欄戰役」，¹¹³ 往後古瑞雲與謝、楊投入中共後才得知，謝、楊是收到中共台灣省工委的命令停止一切活動，而這件事也成為謝雪紅於 1957 年反右鬥爭中被控為「二二八逃兵」的緣由。¹¹⁴

在歷經埔里、水里、魚池各地的游擊衝突後，由古瑞雲指揮的「二七部隊」最終在 3 月 16 日埔里「烏牛欄戰役」，造成國民政府軍隊兩百多人傷亡，最後因為彈盡援絕而就地解散，古瑞雲夥同謝、楊於 17 日從南投竹山逃亡至彰化，再一路往南至高雄左營，並行賄海軍艦艇的軍官，而得已潛逃出海，5 月 22 日抵達廈門，爾後轉往上海，因與中共有所聯繫而受到安排再被轉往香港。¹¹⁵

綜而觀之，從謝、楊兩人在光復初期領導台中人民革命的行動來看，可發現他們儼然接續台灣共產黨未完成的革命，不僅從國民政府接收的同時就已建立「台灣人民協會籌備會」，長期運用報章媒體批判陳儀政府，更在二二八事件後成立地方治安隊攻克台中地區的軍警基地，甚至謝雪紅本人意圖成立人民政府，雖然革命行動最終宣告失敗，但以親身投入革命如此強烈的政治行動，即足以證明，縱然失去共產黨員的身分，他們仍秉持階級批判的原則，無視於民族認同或情感的問題進行武裝革命。對照於蘇新同一時間的政治動向，明顯可以發現兩者的巨大差異，蘇新的階級革命精神，顯然受到他對於外省族群的民族認同所影響，而失去了批判力道，但蘇新對於中國懷有正面的民族情緒，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不是那麼樣的特殊，就如同陳芳明對蘇新的評論所說：

在忍受日本殖民統治長達半世紀之後，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出路幾乎毫無例外的都導向古老的中國文化，從而他們對亞洲古老大陸的政權，也在複雜的政局變化中產生強烈的認同感。蘇新後半

¹¹³ 古瑞雲，《臺中的風雷》，臺北：人間出版社，1990 年，頁 81-82。

¹¹⁴ 古瑞雲，《臺中的風雷》，頁 75-75。

¹¹⁵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268-273。

生的悲劇角色，也就在這段紛亂的時局中開始塑造了。在日據時代，一位堅決擁護台灣獨立的社會主義者，在戰後突然失去剝開政治迷霧的能力，同時也失去對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之間異同的分析能力。¹¹⁶

只是如同前面章節所述，陳芳明認為蘇新對國民政府的這份民族認同感，在二二八事件後漸趨模糊、消失而走向抗暴路線，本文則認定這份民族情感從來沒有消失過，也從沒有對國民政府做出文筆上的批判或實質的武力革命，往後流亡香港期間，蘇新對於中國的民族認同，將更毫無展露的表現而出，且也不同於陳芳明所述，認為蘇新一如台灣知識分子般對於中國古老文化的嚮往，往後他所加入的中國共產黨，是完全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蘇新民族情懷攀附於中國共產黨，僅可能是出自於兩岸一統的民族理念而已。

¹¹⁶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170。

第三章、流亡香港期間的思想轉變

蘇新停留於香港將近兩年的時間中，政治行動也不曾慢下腳步過，與舊台共成員的重新聚首後，合作展開對抗蔣氏政權的文宣戰，提供給當地報紙不少的報導、消息，對外散布台灣島內的血腥鎮壓。若分析這些政治文宣的內容，即可發現蘇新政治立場的劇烈轉折，從光復初期的三民主義、國民政府同情擁護者，轉變為激烈反蔣、反美的立場，同時也冀望台灣成為中國版圖下的一個高度自治省份。本文將探討蘇新滯港期間編輯的社論、報導，並分析其撰寫《憤怒的台灣》一書，試圖瞭解蘊涵背後的民族史觀，透過各種文獻的分析，可與光復初期蘇新的政治立場做出對照，檢視他於二二八事件前後政治思想的變化歷程。

第一節、輾轉流亡

台灣在光復後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即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而來的大規模屠殺，許多臺灣知識分子與政治異議人士紛紛走避海外，這時，英國殖民地香港就成為了政治難民的避風港。由於香港隸屬於英國管轄，即便國共兩黨瀕臨內戰，也無權干涉香港中立地位，自然成為各路流亡人士匯集的中心，這些人的共同基礎都是反對國民黨的專政迫害，大致可分為數種類別，來自中國的民主派人士與中共地下組織人員，台灣則有以廖文毅(1910-1986)、廖文奎(1905-1952)，兄弟為首的獨派，與謝雪紅、楊克煌及蘇新為首的舊台共成員。¹¹⁷

由於國民黨將全島暴動的罪過推諉給台共相關人士，宣稱他們與中共聯合密謀造成二二八事件，前台共重要幹部皆遭到通緝，許多人遭虐死，也有人自首投案，僅有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人成功逃離台灣，他們先後都選擇了香港做為

¹¹⁷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275。

延續政治理想的基地，流亡初期，基於對抗國民黨政府的相同立場曾與廖文毅短暫合作一陣子，但意識形態的分歧終究是難以突破，雙方很快就因理念的不合而分裂，¹¹⁸廖文毅等右派人士主張台灣應接受美國託管，以期在未來達成台灣獨立，建立台灣人自治的台灣民族政權，他們在 1948 年 2 月 28 日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是為第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海外團體。¹¹⁹

但謝雪紅並不贊同廖文毅的做法，她認為因為受限於台灣被國民黨佔據的形勢，必須寄望與中國共產黨合作，並期望有朝一日能解放台灣脫離國民黨統治，在中共聯省自治之下建立高度民族自主的共產社會，而謝雪紅的構想在當時的局勢來看是相當合情合理的，由於 1947 年下半年，國共內戰局勢開始出現轉折，中國共產黨逐漸扭轉戰局占了上風，看似有統一中國的可能性，基於整體戰略的考量下，必須放棄日治時代的台獨主張與中共合作，謝雪紅因而領導台籍左派人士於 1947 年 11 月 12 日組成「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定調為台灣人二二八事件的革命延續，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蔣氏政權並謀求台灣的解放。¹²⁰

此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即運用大眾媒體展開政治宣傳戰，透過雜誌、書籍、報紙等傳播媒介，將台灣的現況與台盟對於未來的期許傳播至海外各地，讓旅外台胞們得知台灣局勢的發展演變，如創立《新台灣叢刊》，運用香港報紙《華僑報》、《大公報》等發表社論與通訊報導，雖然台盟運用的媒體種類五花八門，但其宣傳內容大至不離三項要點，首先，描寫台灣內部的政治問題與蔣氏政權的暴虐無道。二者，反對美國鼓吹台灣獨立及聯合國託管計畫。三者，隨著國共內戰的進行，台盟也對外報導最新戰況及局勢變化。

¹¹⁸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183-184。

¹¹⁹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286-287。

¹²⁰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300-301。

其中影響台盟相關人士最深的舉措，莫過於多次呼應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治宣言，每當中共重要文告發出，台盟也緊跟著呼應，如 1947 年 12 月毛澤東提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以及 1948 年 5 月 1 日勞動節的〈五一號召〉，都是中國共產黨對內宣告即將統一的政治文宣，而台盟也在這兩次宣告後，分別發表〈台灣人民團結起來〉、〈告台灣同胞書〉以做為呼應，¹²¹如此也奠定了台盟人士往後於中共發展的政治基礎，就在 1948 年五一勞動宣言發布後不久，毛澤東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並邀請香港各黨派的流亡人士參予，在數次協商與會議後，謝雪紅等人遂加入中國共產黨，重新延續了共產革命的道路。¹²²

回顧蘇新在香港這段時間中，是相當被台盟所倚重，原因在於蘇新豐富的新聞工作歷練，台盟幾乎一半的文宣都經過蘇新的撰寫、編輯才發布，給予了台盟政治宣傳戰相當重大的幫助。但再次與他並肩作戰的舊台共，尤其是謝雪紅，起初對他並不這麼放心，從上海輾轉流亡至香港的蘇新，在與謝、楊沒有交集十幾年卻再度碰頭，又加上過去台共權力鬥爭的恩怨影響下，謝雪紅、楊克煌難免會懷疑蘇新的政治立場，甚至認為他其實是國民黨派來的臥底：

到香港不久後，石霜湖就給我介紹了幾個人（莊希泉、李自修、施萬青、劉雪漁等）我們計畫組織「台灣問題研究會」和「香港台灣同鄉會」…… 後來施萬青問我：「你在二二八事變後，有沒有做過中央社台中分社社長？」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更加感覺得奇怪。後來施萬青和石霜湖又對我說：「謝雪紅和楊克煌現在也在香港，他們說你是國民黨的特務，專門追他們。說他們到上海，你也到上海；他們到香港，你也到香港。這可能有什麼誤會。」¹²³

¹²¹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293-294、頁 322-324。

¹²²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338。

¹²³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72-73。

爲了釐清蘇新是否爲國民黨派來的特務，甚至派人就近監視蘇新，最後在楊克煌親自與蘇新面談後，才釐清雙方的疑惑：

在這以前，謝、楊曾經派周明裝做一個學生到石霜湖家裡二、三次，試探和偵查我的行動……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經過幾天後，楊克煌就找我談話。他說：「我和謝對你有些不大了解，可能有誤會，所以今天特別來找你談談。」那天我們談了半天。首先我要楊提出他們對我所有的疑問，由我來一一回答。那天楊對我的解釋相當滿意地回去。他知道了過去因大家很少接觸，所以產生了許多誤會。¹²⁴

但無論謝、楊兩人對蘇新的質疑是否屬實，蘇新的政治立場的確就如他們所質疑，可能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變化，由於身爲台盟的重要文膽，滯港期間撰寫了不少文字資料，要得知蘇新的政治思想是否出現變化，勢必從此著手，因此，下一小節將分析蘇新在香港時期發布的報導文章，瞭解其政治態度的轉折，以與光復初期的政治立場做出比較。

第二節、海外宣傳戰

蘇新在香港將近兩年的期間，積極運用文筆的力量試圖扭轉局勢，撰寫至少多達三十數篇通訊、消息、評論給予香港的《華商報》、《大公報》、《文匯報》，以向台灣宣傳國內外形勢，也向國外及中國大陸宣傳國民政府壓迫台灣人民的情況，在這些蘇新提供的報導來源中，多是以台盟政治立場爲出發點而選擇的消息來源，就如同先前所述可歸納爲三個部份，首先爲反對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政

¹²⁴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73。

府，二者為反對美國介入台灣內部事務台灣遭到美國託管或脫離中國獨立，最後為呼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告。

蘇新自從逃亡抵達香港後，就一改光復初期對國民黨政府的同情態度，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強烈批判立場，他將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局勢描述為全台灣的武裝鬥爭，人民對國民黨的反抗未曾停歇，如 1947 年 8 月 8 日提供給《華商報》的報導所述：

台灣人民反美反蔣的「二二八」武裝鬥爭，雖然遭到蔣介石賣國集團的殘酷屠殺和鎮壓，但是各地的人民武裝鬥爭並沒有因此而止，相反地，各地小規模的鬥爭正在不斷日益增長和壯大。¹²⁵

蘇新將二二八事件定調為反抗美帝國主義與蔣氏政權的人民革命，且經過國民政府軍隊屠殺後，革命仍在持續蔓延，這個概念不斷被蘇新一再的強調，又如 1947 年 10 月 5 日《華商報》的報導：

各地人民的反美、反蔣鬥爭仍在繼續中。從「二二八」到「八二二」，到處風傳台灣人民要武裝暴動的消息，魏道明急令全省戒嚴以防意外。就在「八二二」這一天，新竹縣桃園警察局長在白天被武裝人員俘虜……九月二十六日，虎尾鎮辦事處因徵斂百姓捐稅，忽遭武裝人民襲擊，所有聚斂之款悉被奪走。這些事實說明：「二二八」武裝鬥爭雖被蔣介石反動派的軍隊鎮壓了，但各地人民反美、反蔣的鬥爭火燄仍在繼續燃燒中。¹²⁶

¹²⁵ 蘇新，〈從香港看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07-208。

¹²⁶ 蘇新，〈從香港看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09-210。

事實上，台灣全島性的暴動早在 1947 年 3 月的政府大規模報復行動後，就迅速走下坡，蘇新描述的僅是零星個案，甚至他提到的「八二二」事件都可能是政府製造出的莫須有陰謀。¹²⁷另外，過去將糧荒問題的責任追究都歸於日本人與台籍仕紳頭上的蘇新，也在政治迫害過後，全然的將矛頭指向了國民黨做出了全面性的抨擊，如 1948 年 10 月 25 日《華商報》的報導：

國民黨賣國集團在「二二八」以後，對台灣人民的逮捕和屠殺從未停止過，最近台灣警備司令部又開出五百多名黑名單，正在搜捕中。金圓券出現後，台灣經濟已混亂得一團糟。物價瘋狂上漲，搶購風潮滿遍全島，米、油、雜糧幾乎絕市……使米倉的台灣發生了嚴重的糧荒。¹²⁸

由此看來，蘇新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直到他自身被迫害後才有了劇烈轉變，雖然蘇新對於蔣氏政權的態度轉為敵對，但這並不代表他對於中國人也同樣抱持著敵視態度，他仍對於中國、中國民族抱有著一定的情感，從他對於台灣的歸屬定位問題就可略知一二。除了國民黨成為蘇新攻擊的政治標的外，美國也是他亟欲抨擊的對象，因為他視美國在台灣的一舉一動皆為帝國主義捲土重來的徵兆，兩國之間的經濟、軍事交流皆是假借合作之名行殖民台灣之實，而這將導致台灣被分離出中國，1947 年 9 月 20 日《華商報》的報導，就強調美國正在進行託管運動，企圖將台灣分離出中國的統治：

台灣國民黨某參政員曾與美國新聞處主任卡度作兩小時的密談。據翻譯員無意中透露出來的消息，美國新聞處主任談及：（一）開羅會議公報、波茲坦宣言、雅爾達協定雖然有規定台灣的歸屬，可是

¹²⁷ 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頁 332-333。

¹²⁸ 蘇新，〈從香港看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21。

對日和約未締結前，台灣的歸屬尚未正式確定。(二) 美國有意將大西洋憲章適用於台灣；那個時候，台灣人民可以由自己的意志來決定台灣的歸屬。……(四) 台灣人民如願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忙。(五) 台灣人民如願受美國託管，台灣人民可提出希望條件及託管期間……最近數日中，那個參政員和一些紳士等，在北投、草山等地頻頻會見美方人士，會談內容雖還不曾獲悉，但我們可以看出美帝國主義侵略台灣的陰謀，是拉攏台灣的漢奸民賊，鼓動所謂「託管運動」。¹²⁹

從這份報導的語氣，可以推敲出蘇新完全不能接受台灣脫離中國獨立或遭到託管，另外，蘇新宣稱旅港台胞也發表類似的政治意見，在此可清楚看出蘇新認同的民族理念，也就是台灣民族、領土皆歸屬中國一部分：

旅港台胞發表文件，駁「台灣分離運動」的陰謀，內稱：最近美國通訊社連續發表過幾次關於「台灣分離運動」的消息。台灣人民是黃帝的子孫……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是台灣人民的家園；台灣人民斷不能容許任何人來出賣台灣和台灣人民的利益，台灣全體人民也斷不承認在台灣有任何所謂「分離運動」的存在，也斷不承認有任何「將赴美國的台人代表」。所謂「公民投票的要求」，所謂「台灣領袖」，所謂「將赴美國的台人代表」，這些不過是極少數的出賣國家民族的叛徒、外國走狗們的造謠和假冒而已。¹³⁰

蘇新提到了台灣人民歸屬於炎黃子孫，並強調本於民族血緣的基礎上，台灣理應是中國領土一部份的概念，因此極力倡導台灣人民應接受中共的解放，不應

¹²⁹ 蘇新，〈從香港看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08。

¹³⁰ 蘇新，〈從香港看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21。

成爲美國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

國民黨賣國政府目前軍事急劇崩潰，為了挽救危亡、爭取時間，準備力量，再向中國人民反噬，他們大叫什麼「和平」，要求人民解放軍停止前進。這種「和平」是蔣介石賣國集團的陰謀，是違反全國人民的利益的，台灣人民決不同意。全國人民決不容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並反對任何對中國的干涉。台灣人民呼籲全國人民，為建立一個獨立富強的新中國，設若美帝以任何藉口要控制中國國土的任何一個地方---尤其是台灣，中國人民必須不惜任何犧牲向它作戰到底。¹³¹

由上述數篇通訊報導的文獻分析，蘇新的政治立場與二二八事件發生前，有著偌大的轉折，從支持三民主義與擁護國民政府，到二二八事件前夕的轉趨消極，再轉變爲堅決反蔣、反國民黨，甚至轉向支持中國共產黨解放台灣。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政治立場如何轉變，蘇新並不因爲對於國民黨的仇恨，而將中國、中國人也化爲敵對的對象，反而他將希望投射在即將統一中國的中國共產黨身上，期望著中共有朝一日能夠解放台灣，且台灣屬於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信念被蘇新再三強調，這或許多少解釋了光復初期蘇新對於外省族群的維護與崇敬態度，是建構在他所堅信的兩岸民族血統基礎上。

1948年5月1日，中共發表五一勞動節口號，以對中國內、外的群眾號召，身爲「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成員的蘇新，也在同一天發表了《台灣人民的出路》一文，全文內容幾乎完全呼應了中共的政治立場，認爲美國帝國主義極欲延伸至台灣，且台獨不僅不能達到反封建、階級解放的目標，更會分裂中國的民族統一：

¹³¹ 蘇新，〈從香港看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225。

依靠美帝爭取台灣獨立，這一條道路，不但不能解放台灣，反而幫助美帝奪取台灣，促進台灣成為美帝的殖民地。而且在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進入了新階段的時候，在美帝授意之下，陰謀台灣獨立，這是分裂中國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破壞台灣解放運動的反動行為。¹³²

因此，蘇新強調唯有在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建立民主的省自治政府，以走向無產階級社會：

我們相信：團結在毛澤東先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之下，和全國人民連結在一起，配合大陸的人民戰爭，在台灣徹底地進行反美、反蔣的鬥爭，徹底地消滅美帝的侵略和蔣政權的統治，建立民主的省自治政府，徹底地實行土地改革，消滅一切的封建剝削，這才是台灣人民的出路。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道路。¹³³

就在中共發表五一勞動節口號的一個禮拜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也於1948年5月7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內容同樣呼應中共的勞動節宣言，尤其是勞動節宣言的第五條，¹³⁴向台灣同胞宣告，準備參與統一後的人民大會以成立民主政府：

同胞們！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配合全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廣泛展開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台灣分離運動的各種鬥爭，準備參加「政協會議」，「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聯合政府」，這樣，台灣人民才能由

¹³² 蘇新，〈台灣人民之出路〉，《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232。

¹³³ 蘇新，〈台灣人民之出路〉，《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232。

¹³⁴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322。中共五一勞動節宣言的第五條，內文為中共認為應邀請中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也就是人民大會，以商討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美蔣聯合統治的痛苦中解放出來。¹³⁵

綜觀來看，蘇新在香港的一年半時間中，他的政治立場不僅代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觀點，也幾乎同時呼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號召，如此的轉折可以說是源於對蔣氏政權的絕望而衍生，同時也因為兩岸局勢的演變，中共即將席捲大陸的態勢，讓蘇新意識到他的故鄉台灣，仍可能被國民政府盤據，因此只要與國民黨合作的任何人、事、物，都可能導致中國民族的分裂及台灣分離中國領土，這就是美國任何對台灣、國民政府的關連動作，都被蘇新過度放大檢視的原因，比起階級解放，蘇新更關切的是台灣的歸屬問題，任何可能將台灣分離出中國的行爲都不是蘇新所能接受。

但事實上，蘇新對美國託管一事的憂慮，可能是基於民族情緒而過於擴大了，除了來自香港媒體的消息來源以外，沒有更多其它直接證據可以證明美國在 1947 年進行託管台灣的計畫，縱然蘇新所述爲真，畢竟那也可能只是部分美國官員的看法，並非美國對台的官方政策。早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就有部分台灣人向美國表達托管、獨立的意見，如 1947 年 2 月中旬，一群台灣年輕人遞交一份請願書給美國駐台領事官員，以轉呈至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1880-1959)，內容表示台灣人民並不希望台灣歸屬於中國，期望聯合國可以與台灣人民聯合行政，美國政府並未給予任何回應。¹³⁶

即便發生二二八事件後，美國對台灣的外交動作也沒有出現顯著變化，反倒是中國內戰的局勢讓美國對台關係出現些微分歧，1947 年 5 月下旬，於 3 月卸職返國的前美國駐台領事官員柯喬治(George H. Kerr，1911-1992)，向國務

¹³⁵ 蘇新，〈從香港看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13。

¹³⁶ 陳佳宏，《海外台獨運動史：美國「臺獨」團體之發展與挑戰：50 年代中至 90 年代中》，臺北：前衛，1998 年，頁 52。

院提出台灣應受聯軍或美國控制的意見，直到亞洲局勢安定。¹³⁷同年 7 月，美國特使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 1897-1989)訪台，也收到一些主張台獨的年輕人遞交請願書，但魏德邁公開在媒體記者會上，宣布美國並沒有對台灣具有野心。¹³⁸1947 年 9 月底，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 1876-1962)接見獨立派領袖廖文毅等人，司徒雷登答覆「台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鬥。」¹³⁹

從上述看來，美國官方對台灣獨立或接受託管的請願並沒有表示過任何的明確立場，皆僅是模稜兩可的回覆，雖然這可能是外交手段所需的表面功夫，但事實上，美國對主張台獨人士也不抱太大的期待，因為看在美國政府眼裡，主張獨立的團體在人數、組織、武裝和領導方面皆不足以擊敗國民政府，遑論建立反共、親美的台灣政府，主張台獨人士不僅沒有任何武裝和群眾基礎，其政治主張更遠遠脫離現實。¹⁴⁰

美國官方對台的外交模糊態度，從 1947 年持續至 1949 年，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仍秉持不願捲入中國內戰的立場，仍然希望中國政局是由國民黨政府穩定掌握，在這前提下，美國對台灣的基本政策僅是不讓台灣遭到中國共產黨的併吞，而且必須檯面下不公開的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的合作，¹⁴¹即便往後國民黨失去中國，美國政府期許的仍是一個開明派國民黨治理下的台灣，況且，不對國民黨或共產黨做任何的承諾，可與當時即將統一中國的共產黨維持一定的外交關係，如此帶有彈性的對台政策，直到 1950 年韓戰爆發才正式轉變為全面捍衛台灣安全。¹⁴²

¹³⁷ 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頁 320。

¹³⁸ 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頁 335-336。

¹³⁹ 陳佳宏，《海外台獨運動史：美國「臺獨」團體之發展與挑戰：50 年代中至 90 年代中》，頁 53。

¹⁴⁰ 陳佳宏，《海外台獨運動史：美國「臺獨」團體之發展與挑戰：50 年代中至 90 年代中》，頁 55。

¹⁴¹ 戴天昭，《台灣國際政治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 年，頁 347-349。

¹⁴² 陳佳宏，《海外台獨運動史：美國「臺獨」團體之發展與挑戰：50 年代中至 90 年代中》，頁 56。

因此，美國對台政策並非如蘇新的新聞通訊消息來源中，所描述的美式帝國主義重現，即使是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且倡導台灣獨立的美國駐台外交副領事柯喬治，在其撰寫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也提到蘇新的新聞稿內容過於誇大美國在台的行動：

據香港方面的描述，後來這位台灣人曾在美國領事館與新聞處主任會談兩小時，當這位新聞處主任注意到台灣未定的法律地位時，他說台灣在理論上說來仍屬於麥克阿瑟將軍的管轄，因此，他樂意接受台灣人要求幫助的請願。美國在此希望引用大西洋憲章的條文，讓台灣人有機會「決定他們將屬於那一國家的意願」。¹⁴³

由上述柯喬治的描述，無論是地點、事件內容或人物，幾乎跟蘇新所提供的消息內容一致，且柯喬治幾乎完全知悉撰寫報導的人物是蘇新：

該文還很清楚地指出那些希望脫離國民政府統治的台灣領袖們的意願處境。然而這篇文章是由被放逐、後來投到共黨組織下的人所寫的，這人的看法是「任何不同於國民黨的東西都是好的」，而割讓給外國的事萬萬不可重演。在他們看來，計畫中的中美共同訓練事項，即是舊式軍事帝國主義的重演。¹⁴⁴

從上述美國對台外交政策的脈絡分析，可以了解蘇新一再強調的美國帝國主義，並不是覬覦對台灣的殖民利益，而是對於共產勢力的恐懼所形成。但因為蘇新的民族主義情緒，強烈捍衛台灣不可脫離中國領土的信念，任何可能抵觸到這項原則的人、事、物，就成為大中國主義下的民族敵人。事實上，無論是美國在

¹⁴³ 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頁 337。

¹⁴⁴ 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頁 338。

台人士鼓動的託管運動或台獨份子的請願，都始終不是美國政府的官方考量選項，蘇新武斷的認為美國在台灣의行動，即是將台灣獨立分離出中國的想法，不僅可能受到民族情緒影響而過於浮誇，政治宣傳的意義也遠高於事情的正確程度。

第三節、蘇新的台灣歷史論述

除了運用報章媒體對海內外台胞傳播島內消息外，蘇新在香港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動作，即是撰寫台灣史書《憤怒的台灣》，若簡易翻閱《憤怒的台灣》一書的篇幅即可發現，書中內容的章節比例相當極端，是前輕後重的安排，全書總共二百三十五頁，從蘇新認定台灣的歷史從秦代開始，到清朝統治時代結束將近兩千餘年，卻只花了三十七頁，占全書百分之十六的篇幅，日治時代的五十年佔了四十五頁共百分之十九的篇幅，而國民黨不到四年的統治時間卻佔了一百二十八頁，超越全書的一半篇幅，即使以今日歷史教材「輕古重今」的編撰原則來看，章節比例也過於懸殊，因此，與其以史書看待，不如以政治宣傳品視之更為恰當。蘇新撰寫《憤怒的台灣》一書的目的在於，他認為台灣人的歷史意識太過薄弱，為喚醒台灣人的民族意識，有必要書寫一部以台灣人民為主體的歷史著作，在自序的部分如此寫著：

至於台灣的歷史，尤其是自從荷蘭人佔領了台灣以後。直至現在為止，歷代的統治者是如何壓迫和剝削台灣人民，而台灣人民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如何對異民族和反動派的統治者進行過艱鉅而壯烈的鬥爭，都很少有正確的認識。¹⁴⁵

¹⁴⁵ 蘇新，《憤怒的臺灣》，臺北：時報文化，1993年，頁11。

重視歷史是決定民族未來的重要關鍵，雖然《憤怒的台灣》中，日治時代以前的台灣早期歷史論述內容相當稀少，但若經過進一步分析，即可發現其中蘊含蘇新隱晦不明的大中國史觀，也就是台灣長久屬於中國領土一部份的觀點，蘇新甚至運用這個概念作為整本著作的主軸，因此分析書中的歷史內容實具有相當的必要性。首先在第一章的開頭，敘述台灣的地理四面環海，唯有西邊與中國最為接近，地理及歷史的淵源深厚，且台灣早在秦代就與中國有所接觸：

在我國文獻上，已有關於台灣的記載，據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年)，始皇曾派福建人徐福等到東海及南海活動，也許和日本及台灣有相當的貿易。據後代史家的考證，當時的「夷州」就是現在的台灣。¹⁴⁶

據蘇新的瞭解，中國與台灣早在秦朝就有貿易活動，更有「夷州」一詞形容台灣，到了西漢武帝時期，由於中國進攻東南方閩、粵一帶，將之納入版圖控制，因此，中國與台灣的商貿關係更趨緊密：

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進擊福建、廣東一帶及安南東部地方，於是南海沿岸之地又受中國中央政權的統治，因而台灣和漢朝的交通更趨頻繁，當時文獻上的「東台」就是秦時的「夷州」，也就是現在的台灣。¹⁴⁷

除了「夷州」外，也出現「東台」一詞指稱台灣。到了魏晉南北朝的大動盪時代，因為中原的混亂，漢人大量南遷，並有部分漢人從福建遷徙至台灣，開啓了漢人社會在台灣的發展：

¹⁴⁶ 蘇新，《憤怒的臺灣》，頁 14。

¹⁴⁷ 蘇新，《憤怒的臺灣》，頁 14。

中原為西北侵入的各種異族所佔，漢族大舉南遷。從那時起似乎已有人由福建方面漂泊到台灣來。於是漢族的文化與政治，對於先住民「馬來族」的番人開始接觸。¹⁴⁸

漢人文化自此在台灣落地生根，並與原住民族有了接觸，但蘇新指出文獻上確實可考的漢人移居台灣，始於隋、唐時代，甚至因為隋煬帝的攻擊政策，占領了臺灣西部：

據載：隋代大業元年(公元六零五年)，煬帝以為對台灣及呂宋等的貿易可獲巨利，乃從海商何蠻的建議：展開南方海上「蓬萊諸島」的活動，以開拓資源及振興貿易。當時台灣住民已有不少漢民族，所以煬帝以為他的海外政策在台灣可能順利推行。但實際上，番族的部落酋長勢力甚大，並未對煬帝的政策表示歡迎，於是煬帝即派虎賁(虎賁將軍陳稜)率領一萬大軍，遠征台灣，占領台灣西部沿岸一帶。中國正式以武力佔領台灣，實始於此時。¹⁴⁹

隋煬帝東進的海上政策，受到原住民的部落勢力的反對，因而決定進攻台灣，占領台灣西部海岸領域。從上述蘇新對於台灣早期與中國間的聯繫關係來看，台灣的歷史演進幾乎與中國同步，從中國最早的秦帝國起就有了連結、貿易關係，漢代延續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漢人遷徙至台灣居住，到了隋代正式以國家力量佔有台灣部份領土，甚至在唐代時台灣原住民部落向唐代朝貢：

¹⁴⁸ 蘇新，《憤怒的臺灣》，頁 15。

¹⁴⁹ 蘇新，《憤怒的臺灣》，頁 15。

這次的遠征和佔領，使台灣諸部落認識西方大國「唐山」的強大。至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台灣諸部落即派使節入京朝貢。¹⁵⁰

時間發展到唐代以後，漢人社會在台灣蓬勃發展，並成爲臺灣社會的主要族群，蘇新更指出，臺灣自此穩固的成爲中國領土一部分：

唐代以後，台灣和中國的關係越趨密切，閩粵兩地的漢族更多往台經商或在台定住，特別是福建的漢族在台灣의 勢力日趨鞏固。天產豐富的寶島台灣，由於先進中國民族的大量移往，文化也日趨發達，以後差不多七八百年，直到明代。所以台灣主要的地區都爲漢族所經營開拓，先住民的馬來族即逐漸退居山間，可見台灣久爲中國的領土。¹⁵¹

然後蘇新補充解釋客家人遷台的緣由，同樣也受到中原動亂的影響，在唐、宋時期遷徙至閩、粵、台的漢人族群中，客家人是其中一支：

唐末與宋末，中華民族兩度受過異族的壓迫，實行民族的大遷移，由中原各省向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各地移住，成爲今日浙贛閩粵邊區一帶著名的「客族」。南下的中原民族，在閩粵一帶找到了臨時的地盤之後，由於生活環境的艱苦，不少拋棄家室，遠出謀生，此時到台灣的特別多，爲後來台灣住民主要的一系。同時，原住閩粵一帶的漢族，因中原外來民族的壓迫，也多向台灣遷居。¹⁵²

¹⁵⁰ 蘇新，《憤怒的臺灣》，頁 15。

¹⁵¹ 蘇新，《憤怒的臺灣》，頁 15-16。

¹⁵² 蘇新，《憤怒的臺灣》，頁 16。

受中原戰亂影響而遷徙到台灣的漢人越來越多，發展到了宋代，漢人社會已經成為台灣主體族群，但元代蒙古政權僅著眼於擴張，征戰歐亞大陸，並沒有重視漢人社會居多的台灣，所以在歷史文獻顯少出現臺灣的記載：

在宋代，台灣西部一帶沃地，都已為漢族特別是福建人開拓，農、工、商各業都已相當發達……十三世紀末葉，蒙古族的元朝統治了中國，忽必烈完成了大陸政策之後，東則遠征日本，南則征略安南、爪哇及南洋羣島，對於「小小的台灣」，未加以重視。

因此，在元朝期間中，中國各種史籍上，很少關於台灣的記載。¹⁵³

總結以上所述，蘇新所呈現的台灣早期歷史，可以歸納出數項重點，首先，從上古的秦、漢時代起，中國與台灣之間即開始有商業貿易的接觸往來，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混亂導致漢人開始逐漸移居台灣，隋代則首次以軍事力量占領台灣西部沿海地帶，且當時已有不少漢民族定居，自此成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發展到唐、宋時代，台灣西部已是漢人社會為主體，原住民族逐漸遷往山區，元代的蒙古人政權則因關注歐亞各地的戰爭，鮮少顧及臺灣，因此與台灣之間幾乎沒有什麼關連。

這是蘇新描述的台灣歷史發展圖像，但歷史記載真是如蘇新所寫？《憤怒的台灣》一書並沒有對資料出處作註解，因此難以斷定其史料出處為何，為了解蘇新呈現的台灣史觀是否正確，本文先從其參考書目中著手。分析《憤怒的台灣》一書的參考書目後，可發現論及台灣歷史發展的書目有兩本，一本是王子毅於1944年出版的《台灣》，¹⁵⁴另一本為徐子為、潘公昭合著的《今日的台灣》於1945年出版。¹⁵⁵比對過這兩本書對於台灣早期歷史的描寫，將會發現蘇新幾乎完全節

¹⁵³ 蘇新，《憤怒的臺灣》，頁16。

¹⁵⁴ 王子毅，《台灣》，自由出版社，1944年。

¹⁵⁵ 徐子為、潘公昭，《今日的臺灣》，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1945-46年。

錄《今日的台灣》中的歷史敘述，舉凡歷史事件發展、敘述模式皆如出一轍，甚至許多章句是一字不漏的複製而來，¹⁵⁶蘇新幾乎完全承襲《今日的台灣》一書中的台灣歷史觀點，但若進一步比較王子毅編的《台灣》一書，將會發現史觀相互矛盾的情況：

迨宋、元時，華人始漸移此島，郁永河的《裨海紀遊》裡說：「相傳臺灣空山無人，自南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為颶風飄至，各擇所居……」¹⁵⁷

《台灣》一書描述漢人遷往台灣始於宋、元朝，並引用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佐證，這項觀點與蘇新認為漢人遷台始於晉、隋朝，是有很大的時間落差，且兩者更大的差異點在於元朝，《台灣》一書敘述元代於澎湖設置第一個正式政府機關「巡檢司」，功能類似於今日的警察局：

元時，設巡檢司於澎湖，明代初年又把華人遷回，並廢除巡檢司…¹⁵⁸

管理海外移民的巡檢司是由遊牧民族政權所設立，反倒是漢人政權的明朝廢除，王子毅編著的《台灣》對於台灣歷史發展的描述，與蘇新的觀點有相當大的落差，更有著與《憤怒的台灣》截然不同的結論，認為中國歷史各朝代皆不重視經營臺灣，元朝在澎湖設立巡檢司，反而還凸顯出蒙古人對於海外移民的積極治理性：

綜上所述，則知我國歷代皆視台灣為荒嶠，不屑經營，故除私家的劉記略有記載外，而見於正史者甚少……¹⁵⁹

¹⁵⁶ 徐子為、潘公昭，《今日的臺灣》，頁 15-16。

¹⁵⁷ 王子毅，《台灣》，頁 125。

¹⁵⁸ 王子毅，《台灣》，頁 125。

對照兩方的歷史觀點後，我們可以明顯看出王子毅描寫的台灣歷史，完全與蘇新及徐子為、潘公昭的中國史觀截然不同，一方認為中國從不將台灣視為領土，一方則認為台灣從上古時期就是中國一部分。但歷史事實不應有這麼大的歧異，既然兩本書都被蘇新作為撰寫台灣歷史的參考書目，實則難以忽視兩本書截然不同的史觀，很明顯的，蘇新選擇了他所想呈現的歷史圖像，也就是大中國主義的史觀。雖然知道他在採用資料的過程作出了篩選，但並無法得知蘇新是否進一步的探究原始史料中的台灣歷史為何，但既然作為史書，理應探究其中的內容真實與否，畢竟這兩本書的歷史論述是南轅北轍的不同，為何蘇新全然斷定大中國史觀而完全捨棄王子毅的歷史論述？由於《台灣》、《今日的台灣》二書也是沒有對資料出處作註解，若不分析第一手史料，就難以斷定孰是孰非，也可能很難理解蘇新篩選史料的原委為何。

若稍微深入了解現今的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就會發現台灣早期歷史中的高度爭議性，由於在宋、元朝以前描寫台灣的史料稀少，論述內容又過於簡短，所謂的「台灣」概念在史料中並不精確，甚至連地理位置都是相當模糊的，¹⁶⁰本節將運用文獻資料比對的方法，將曾被提及可能為台灣的史料，來與蘇新筆下的台灣歷史做出比較，首先從《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看起：

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¹⁶¹

¹⁵⁹ 王子毅，《台灣》，頁 126。

¹⁶⁰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 總論明人的台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第 40 期，2007 年，頁 96-102。

¹⁶¹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卷 47，頁 1136。

大意是孫權派遣軍隊求「夷洲」及「亶洲」，但動機不明，軍隊到不了「亶洲」，就只能到「夷洲」，並攜走數千人民返回，雖然蘇新指稱「夷洲」就是台灣，但礙於此段史料內容過於簡短，完全沒有提及「夷洲」及「亶洲」的地理絕對位置或相對位置，根本無法判定「夷洲」究竟為何地。另外一則史料也提及到「夷洲」的地理方位，《後漢書·東夷列傳》則提到：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齧尾狀……」¹⁶²

此段史料指出「夷洲」的地理相對位置，位於「臨海」東南二千里，「臨海」意指當代的臨海郡，大約是今日浙江東部沿海地區，而三國時代的一里大約四百多公尺，¹⁶³所以兩千里代表今日八百多公里，若以數百公里距離來做粗估，依據文中所述的風土民情，可能符合條件的不僅只有台灣，沖繩也有不小的可能，因此要以此段史料斷定「夷洲」是台灣，仍然過於武斷牽強。爾後，被蘇新認為已占有台灣領土的隋代，在《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中提到可能為台灣的敘述：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¹⁶⁴

這段簡短的文字道出了「流求國」的地理相對位置，在今日福州以東航行五天可到達，爾後，隋煬帝甚至因故派兵攻打「流求國」，造成死傷慘重，甚至俘虜當地住民數千人：

¹⁶²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85，頁2822。

¹⁶³ 丘光明，《中國古代度量衡》，臺北：臺灣商務，1994年，頁41。

¹⁶⁴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81，頁1822-1823。

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撓之，流求不從……帝遣武貴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口鼈嶼，又一日便至流求……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¹⁶⁵

隋代的建安郡即今日福建一帶，建安郡首府即今日的福州，若從福州往東航行，可到達處於相同緯度的沖繩首府那霸，反倒是台灣，不僅緯度方位不符，況且從福州航行五日才能到達台灣也不甚合理，¹⁶⁶認定「流求國」就是指稱台灣的說法並不怎麼可靠。在現今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的普遍認為，其實要等到宋、元時代，台灣地理位置真正開始明朗化，就如台灣史學者周婉窈《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一文內容中，認為文獻中出現完整的台灣地理概念，始於修撰於元朝的《宋史》，在〈外國傳七〉首列〈流求國〉提到：

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姻火相望。其國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植棘為藩，以刀稍奇矢劍妓為兵器，目示月盈虧以紀時。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厥土；天壤，無賦斂，有事則均稅。¹⁶⁷

雖然《宋史》中又再度出現「流求國」，但顯然與《隋書》中所提及的流求國明顯不同，不僅出現「澎湖」一詞，也如同史料所述，若從今日泉州向東的確可輕易到達澎湖群島，另外，元人汪大淵《島夷志略》一書也提到澎湖與台灣：

¹⁶⁵ 魏徵等，《隋書》，頁1824-1825。

¹⁶⁶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 總論明人的台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第40期，頁100。

¹⁶⁷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491，頁14127。

島分三十有六，巨細相間，坡隴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間，各得其名。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有草無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氣候常暖，風俗樸野，人多眉壽。男女穿長布衫，系以土布……地隸泉州晉江縣，至元年間，立巡檢司……¹⁶⁸

文中描述澎湖的諸多群島及土地貧瘠的地理形勢，從福建泉州航行兩天就可到達，且當地已有泉州移民組成的社群，元朝便設立巡檢司以行管理。另外，汪大淵也從澎湖航行至台灣，記載地理條件與當地原住民族的風土民情：

地勢盤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頭，曰大崎。其峙山極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夜半則望暘谷之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土潤田沃，宜稼穡。氣候漸暖，俗與澎湖差異。水無舟楫，以筏濟之。男子、婦人拳發，以花布為衫。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知番主酋長之尊，有父子骨肉之義，他國之人倘有所犯，則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頭懸木竿。地產沙金、黃豆、{麥}[黍]子、硫黃、黃蠟、鹿、豹、鹿皮。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瓷器之屬。¹⁶⁹

從汪大淵的史料所述，台灣與澎湖的地理位置已趨近今日的地理認知，且兩地社會風俗的不同，顯示漢人社會在當時僅在澎湖有所發展，台灣仍處於原始部落社會，但已有初步的農業與貿易發展。

綜合上述諸多史料的比對分析，可以發現在中國進入宋、元時代之前，以往被認為是台灣的地理名詞，在史籍上是模糊不清又難以判定的，武斷指稱它們為

¹⁶⁸ 汪大淵著，蘇繼局校釋，《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5。

¹⁶⁹ 汪大淵著，蘇繼局校釋，《島夷誌略校釋》，頁16-17。

台灣往往是穿鑿附會而成，漢人文化要到宋代農業技術進展，使得福建人口密度飽和，多餘人口外移到澎湖群島移居後，台灣的概念才會漸漸明朗於史料記載中。¹⁷⁰由此可見，台灣早期歷史與蘇新所描述的有著截然不同差別，雖然無法得知蘇新究竟分析過第一手史料與否，但可以確定的是，若全然以第一手史料來陳述台灣歷史，蘇新的大中國史觀將全然崩潰，從蒙古人在澎湖設立巡檢司一事就可得知，積極管理漢人外移的竟是遊牧民族政權，而非漢人政權，遑論隋、唐時代台灣就已是漢人社會的說法。

除了參考上述諸多史料與著作外，本文也將探討蘇新的中國史觀是否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影響，由於蘇新停留香港期間，其政治立場經常與中共相呼應，同一時間也寫出《憤怒的台灣》一書，這不禁讓人聯想到，蘇新可能受到毛澤東或中國共產黨對於臺灣歷史、民族觀點的影響，亦或爲了往後可能加入中國共產黨，而迎合中共立場撰寫出大中國史觀的台灣歷史。爲釐清蘇新大中國史觀的真正源頭，本節將探討中國共產黨歷來對於台灣民族的觀點，及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對於台灣問題的個人看法，以瞭解蘇新是否受其影響。爲了解中共的官方民族觀點，本節後半段將大量參考蕭欣義〈祖國臍帶誰剪斷？中台關係史的回顧〉一文，¹⁷¹文章詳細分析國共內戰前，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對於臺灣問題的立場與觀點，這對釐清蘇新大中國史觀的起源，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祖國臍帶誰剪斷？中台關係史的回顧〉一文開頭就點出，中共長期支持台灣獨立的歷史事實，台灣共產黨於 1928 年成立時，黨綱內文明確追求台灣獨立，而台共卻是由中、俄、日共聯合扶植成立，其中幫助最大的正是中國共產黨，如此直接證明了中共認同台灣民族獨立的立場。同年 7 月，中共舉行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裡面提到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問題，在其團章中，把居住於中國

¹⁷⁰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年，頁 103-104。

¹⁷¹ 蕭欣義，〈祖國臍帶誰剪斷？中台關係史的回顧〉，《台灣之將來：學術論文集》，高雄：新臺政論雜誌，1986 年。

境內的台灣人視為與蒙古人、朝鮮人、越南人等民族同地位的少數民族，因此敦促各地黨支部成立少數民族委員會，上述會議決議文中所提到的台灣人，指涉的僅是少數僑居於中國的台灣人，並被歸納於非漢族群的少數民族或外國民族。

¹⁷² 除了黨的政策方針將台灣人民視為非漢族群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於 1936 年 7 月 16 日，在延安會見外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斯諾問毛澤東中國人民是否要收復所有被日本占領的領土，毛澤東答覆：

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州必須收復。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鬥爭。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至於內蒙古，即是中國人和蒙古人共同居住的地區。我們要努力把日本驅逐出去，協助內蒙古建立一個自治區。¹⁷³

從這一段重要的訪談中可以得知，毛澤東將台灣與朝鮮視為非中國領土，原因在於台灣、朝鮮內部的多數居民不是中國漢人，獨自建立起民族國家為理所當然，毛因而鼓勵台灣與朝鮮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至於內蒙古地區的領土問題，毛澤東認為此地是漢、蒙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因此不鼓勵獨立建國，要在中共領導下設立高度自治區。如此以民族作為領土歸屬的判准依據，往後毛澤東也多次提及，於 1938 年 10 月，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論新階段 -- 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再次鼓勵朝鮮、台灣等少數民族反抗日本統治：

¹⁷²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9/content_696160.htm)

¹⁷³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8, p.p.88-89. 轉引自蕭欣義，〈祖國臍帶誰剪斷？ 中台關係史的回顧〉一文，頁 13。

中、日兩大民族的人民大眾及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統一戰線。¹⁷⁴

透過分析中共早期的各式政治會議報告，與毛澤東的個人口述紀錄，可以得知在 1949 年統一中國之前，中共將台灣、朝鮮、越南人民視為非漢民族，更多次鼓勵三個民族皆應獨立建國，從蕭欣義文章的其中一段即可輕易瞭解：

中共把臺灣人當做一個民族，主要是從文化上來說的，而不是從血緣上或種族上來說的。在一九四三年前的文獻裡面，臺灣民族宛如朝鮮民族、安南民族一樣，都被中共及國民黨認為應該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地位。¹⁷⁵

其實，中國共產黨早期將台灣視為非漢族看待，並不是那麼樣的奇特，因為基於第三國際的民族聯合陣線策略，鼓吹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獨立建國的動作，即形同向國民黨政權、日本殖民地的反抗，對於當時政治實力不甚強大的中國共產黨，採取民族聯合陣線是相當具有助益的策略考量。雖然這樣的立場，在國共內戰爆發後有了改變，就從 1947 年 3 月 20 日中共官方報《解放日報》的一篇評判二二八事件的社論〈台灣自治運動〉，來了解中共對台立場的轉折。有鑒於內戰局勢，台灣島內又發生二二八事件，中共同樣鼓吹反蔣，但不再鼓吹臺灣走向獨立，而是高度自治：

台灣人民和平的自治運動，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武裝大屠殺，迫得起而自衛，到本月八日已發展成為武裝的鬥爭。……八日事變爆發後，蔣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緊其武裝的進攻，開往台灣共有兩個

¹⁷⁴ 毛澤東，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六冊，東京市：蒼蒼社，1983 年，頁 218-219。轉引自蕭欣義，〈祖國臍帶誰剪斷？ 中台關係史的回顧〉一文，頁 14。

¹⁷⁵ 蕭欣義，〈祖國臍帶誰剪斷？ 中台關係史的回顧〉，《台灣之將來：學術論文集》，頁 15。

師，即第二十一師與第二十師。蔣介石並派了白崇禧、朱紹良等往台灣指揮。蔣介石的意圖，顯然想把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淹沒在血泊中。¹⁷⁶

中共將二二八事件定調為台灣人民和平尋求自治的抗暴運動，但因為蔣介石的軍事鎮壓而遭遇極大的挫敗，並將台灣的自治運動與中共在大陸的內戰做了連結：

如果略為溫習抗戰勝利後台灣發展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台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之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於蔣介石逼出來的……僅僅為了要求自治，就非武裝鬥爭不可，這不僅台灣的經驗如此，解放區的經驗也是一樣。中共二十餘年的鬥爭，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地方自治。¹⁷⁷

從上述中共領導人、黨官方政策及官報社論等文獻所見，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統一中國以前，純粹將台灣人民視為非漢族群看待，雖然中共在國共內戰之前鼓吹台灣獨立，而後才轉變為鼓吹自治，但始終沒有提及台灣歷史問題，既沒有認定台灣應歸屬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也從未主張應該從日本手上歸還，更遑論提出延綿長達兩千年的大中國歷史觀。在從未主張兩岸統一是在建立在共同民族血緣的基礎上，蘇新的民族統一歷史觀，是與中共長期的聯合陣線策略不符的，因而本文在此排除了中共影響蘇新大中國史觀的可能性。

統整以上所述，會有一些疑問仍尚未解決，何以蘇新需要陳述一段刻意建構的史實呢？為何在兩種立場完全不同的史觀之間，選擇了大中國史觀下的台灣歷

¹⁷⁶ 楊克煌，《台魂淚（二）：我的回憶》，頁 327。

¹⁷⁷ 楊克煌，《台魂淚（二）：我的回憶》，頁 327-328。

史？蘇新為闡述自身期許政治理想的正當性，也就是消滅蔣氏政權與日本餘孽讓台灣成為中國統治下的共產社會，蘇新運用了「集體歷史記憶」的概念，將之鑲嵌於《憤怒的台灣》一書中，透過攀附擁有中國悠久綿長的歷史，塑造出台灣長久以來就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幻象，進而衍伸出大中國一統主義也必須延續至未來的觀點。

另外，蘇新也藉由「歷史正當性」這項重要概念，為自身的政治信念建立堅強的理論基礎，假若拋棄台灣長久為中國領土的「建構史實」，蘇新就僅能赤裸裸的在書中抨擊日本人與國民黨在台灣的暴政，如此也將會落入立場偏頗的口實，因為台灣歷史並不像蘇新所建構的長期受到中國治理千餘年，台灣正式劃入中國版圖也不過三百餘年，更別提及中國政權長期對台灣的消極治理，倘若呈現真實的歷史脈絡，勢必無法喚起讀者的民族認同，唯有建立台灣與中國之間看似淵遠流長的血脈關係，才能有批評日本人為「寇」、國民黨為「賊」的立足點，讓非漢人族群的外來民族「占據」台灣的史實成為「竊盜」行爲，使台灣回歸中國這項理想有了強大歷史事實作為政治實踐的基礎。雖然在《憤怒的台灣》一書中描述台灣早期歷史的篇幅極少，但從攀附中國歷史的角度來看，蘇新不僅瞭解建構歷史記憶的概念，也相當熟悉歷史政治功能的運用。

第五章、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號角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長期以文宣呼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告，並隨著中共一統中國後，最終被北京當局承認為一個民主黨派，臺盟的運作中心也從香港遷往至北京，繼續從事解放台灣的任務，謝雪紅、楊克煌等人也被任命為政協委員，而肩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宣傳重任的蘇新，竟被排除在政協代表名單外，但卻也因禍得福，暫時遠離了中央權力鬥爭的傾軋，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才遭受波及，下放勞改長達七年。雖然政治生涯就此黯然告終，但晚年時期的蘇新仍寫作不輟，對台灣政局發展與兩岸分離的看法，一一記錄於稿紙之上，直到晚年仍依舊掛念他無法歸返的家鄉台灣。本章將檢視蘇新晚年手稿中，對於台灣獨立運動及兩岸分離局勢的個人看法，與其背後蘊含的民族思想觀點。

第一節、政治生涯的起落

自 1949 年台盟前往北京後，謝雪紅、楊克煌被列為中央政協委員，成為向台灣宣傳統一的看板人物，可是與他們長期並肩作戰的蘇新，並未被列為政委，但轉入中共的頭幾年，是頗受北京高層重用的，自 1949 年一抵達北京就住在中南海特區，並在周恩來的指導下擔任國務院統戰部研究室資料組組長，¹⁷⁸翌年 1950 年周恩來擔任外交部長，蘇新原先也要被任命為周恩來直屬的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但此事未成，據蘇新自身的說法 是謝雪紅極力阻擾所導致：

可惜出任日本科科長的事，因謝雪紅極力反對而不成……她是
可以當個臺盟的主席，公開出來講幾句話，這樣子而已。這樣子也

¹⁷⁸ 蘇新，〈蘇新回憶錄〉，《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89-90。

很好，她做表面的事，我們做實在的事情，她要是好好做，而我也是擁護她的，她又何必呢？那麼驚(怕) 向這個說壞話，向那個說壞話，報告過來，報告過去，搞得亂糟糟的……¹⁷⁹

雖然蘇新並未提到謝雪紅在幕後阻擾蘇新擔任日本科科長一職的理由與動機為何，但回顧兩人在日治時期舊台共的鬥爭奪權過程來看，謝雪紅干涉蘇新升職一事，可能是過去的政治恩怨而導致，蘇新也自此被北京中央冷落，不僅升遷上遭受限制，甚至被視為潛在的反動份子。外交部工作一事受阻後，蘇新即接下中共對台的宣傳工作，1950年8月，中共華東區台灣工作委員會成立，蘇新被中央指派擔任宣教科副科長，負責對台宣傳統一的任務，此後，蘇新的職位多次調動，但都不離對台廣播文宣工作的職務，1953年4月，蘇新出任華東台台灣科科長。隔年6月，到北京籌備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廣播部，並歷任業務秘書、新聞組組長、調研組組長、節目組組長、閩南話組組長等職位。¹⁸⁰這數年的時間，蘇新可謂是相當平穩的度過，但反觀與他對立的謝雪紅卻面臨相當嚴峻的政治考驗。

從1951年年底開始，中共展開了「三反」、「五反」運動，主要在國家機構和國營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政治改革運動，¹⁸¹但看似美好的政治口號下，實為政治權力鬥爭、剷除異己的大好機會。雖然台盟在謝雪紅領導下，與中共中央關係良好，但檯面下實則暗潮洶湧、派系林立，就在謝雪紅數次無法妥善處理台盟內部人事問題的情況下，不滿謝雪紅領導風格的各派人士，就趁著三反運動一併進行奪權，事後謝雪紅雖保留住台盟主席位置，但權力完全遭到架空，楊克煌的秘書長職位也遭到拔除，¹⁸²謝、楊兩人也不再對台盟內部有任何干涉意見，於1953、1954年間搬遷至上海定居，但台盟掌權人士竟又在1957

¹⁷⁹ 蘇新，〈蘇新回憶錄〉，《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91。

¹⁸⁰ 黃文源，《蘇新的革命道路——一位台共在東亞共產運動的矛盾與困境》，頁173-174。

¹⁸¹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424-425。

¹⁸²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431。

年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鬥爭中，再一次清算謝雪紅，幾乎徹底摧毀她的政治生涯。

183

反觀遠離權力中央的蘇新，可能受到謝雪紅先前在職務調動的干擾，而讓他保持了安全距離脫離政治權力風暴，雖然也險些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遭到清剿，¹⁸⁴但要直到文化大革命全國不分上下的全面動盪，蘇新才遭到鬥爭整肅：

文化大革命那時就給我定了一個「叛徒」，只定了這個罪名，別的也沒辦法。但是「叛徒」，也沒有證據阿。所以就提那種解釋不了的，沒有辦法理解的問題。比如說「我怎麼能出來（出獄）」「能出來的一定有妥協」「為什麼承認呢？共產黨員是不可以承認的，你做的事情怎麼跟敵人說呢？」¹⁸⁵

蘇新這段回憶述說的是，在日治時代台共被清剿，蘇新入獄期間，遭日本警方刑求逼供下說出了些許的口供，也就因為這段過往的紀錄而被定罪為叛徒，1966年，時年五十九歲的蘇新被下放勞改，期間歷經監督勞動兩年，農場工作兩年，又於1969年被開除黨籍，再到河南省中央廣播事業局「五七幹校」勞動，直到1974年，服完一共七年的勞改結束後，年事已達六十七歲的蘇新才得以回到北京，展開他退休的生活。¹⁸⁶爾後，從勞改結束到去世前的七年時間，蘇新並沒有就此停下他的政治熱誠，尤其是他對於台灣政局的關心，仍運用他閒暇的退休時光，將他一生中在新聞工作所獲取的各式資訊、歷史資料做統整，期間一共編纂《閩南語之形成與演變、語音、語法》、《從香港看台灣》、《閩南語語法》、〈關於台灣鄉土文學〉、〈關於「台獨」問題〉、〈連溫卿與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實行過三民主義嗎？〉等著作，由此可見他對於台灣的熱愛並不因文革的痛苦經歷而澆熄。

¹⁸³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464。

¹⁸⁴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187。

¹⁸⁵ 蘇新，〈蘇新回憶錄〉，《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92。

¹⁸⁶ 黃文源，《蘇新的革命道路——一位台共在東亞共產運動的矛盾與困境》，頁 174。

就在生命的最後數個年頭，蘇新終究獲得了政治平反，1978年蘇新恢復中國共產黨黨籍，且被遷調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台播部工作，並在家中培養電台閩南語廣播員，1979年，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第二屆總部常務理事、研究室主任，又於1980年，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委員會委員。¹⁸⁷但或許政治平反所帶來的喜悅與政治地位已經來的太晚，1981年11月13日，時年七十四歲的蘇新因肺氣腫併發多重疾病，在北京長眠於世，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結束了壯烈的一生。

回顧蘇新在中國共產黨長達三十餘載的時間，嚴格來說，他完全失去了政治批判的角色及精神，成了北京當局照本宣科的政令傳聲筒，若要說起蘇新可能有過的批判，台籍小說家陳若曦(1938-)曾以蘇新為故事主角所撰寫的小說〈老人〉一文中，描述他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所做出的批判：

大鳴大放對誠實的幹部來說，是一場大騙局。本著對黨知無不言的原則，他(蘇新)對幹部執行的偏差提出了懇切的意見，批評了對台統戰政策的錯誤措施……他是屬於帽子拿在手裡的一羣，幾次做了違心的檢討，才僥倖沒有被戴上。¹⁸⁸

這可能是蘇新在中共時期發出過的唯一批判聲音，往後文革期間經歷了七年的勞改，加上年事已高，政治活動基本上以尋求自我平反與抨擊國民黨為中心，對於政治的批判力道更早已不若當年。即便如此，並不代表蘇新晚年留下的許多著作沒有探討的價值，若稍微分析蘇新晚年的諸多文章，即可看出蘇新仍相當掛念台灣時局，對於台灣的現況、未來發展都有相當程度的期許盼望，其中，蘇新不斷強調兩岸統一的政治展望，並用歷史事實去佐證他的論述，當然，更包涵了

¹⁸⁷ 黃文源，《蘇新的革命道路——一位台共在東亞共產運動的矛盾與困境》，頁 174。

¹⁸⁸ 陳若曦，〈老人〉，《現代小說叢刊》，臺北：聯經出版社，1978年，頁 39

他的民族觀點，因此，下一節將深入分析蘇新對於兩岸分合的個人見解，與其背後蘊含的民族思想。

第二節、一個中國的民族信念

就在逝世前一年，蘇新完成〈關於「台獨」問題〉一文，¹⁸⁹將台灣歷史上所出現過的台獨運動做出整理，並闡述他個人對於台獨的反對立場，本論文要探討這篇文章的原因即在於它的時代特殊性，因為當代有關於台獨的相關著作多帶有強烈政治立場及嚴重意識形態偏頗，全然以宣傳作為目的而撰寫，並不具有以針對台獨為研究主題的客觀性，台灣史學者陳儀深對於台獨研究曾有下列敘述：

各種流派與說法也呈現百家爭鳴雖然臺獨的相關史料可謂汗牛充棟，但專門以臺灣獨立運動作為研究主題的學術著作仍然稀少。僅有2005年陳佳宏的博士論文〈戰後臺灣獨立運動之發展與演變(1945-2000)〉，以及同年許維德在Syracuse大學的博士論文〈在流離中改變國家認同：以認同形成取向來分析美國臺獨運動參與者的傳記〉。¹⁹⁰

從陳儀深對台灣獨立研究的描述可以得知，即便在經歷解嚴後將近 20 年的時間，也才出現兩本專門以台獨作為獨立主題的研究著作。另外，陳儀深所提到的著者陳佳宏曾撰寫《海外台獨運動史》一書，內文也曾評論過往台獨文章的特色：

¹⁸⁹ 這篇遺稿是蘇新於「台盟」研究室所寫的報告，所署日期為 1980 年 5 月 5 日。

¹⁹⁰ 陳儀深，〈台獨主張的起源與流變〉，《台灣史研究》，第 17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134。

早期(70年代至80年代末)有關於討論台獨的文章其實是有一些，其中也會有談論到美、日台獨團體的內容。但或許是政治環境使然，這些文章(多發表在期刊上)的政治宣傳、文告的意味濃厚，罵街之文也不少；再加上當時海外台獨的原始資料不易獲得，所以這類的文章難免會有不少疏漏、錯誤之處。¹⁹¹

由此可知，在進入 21 世紀前，「台獨」總是成為政治宣傳或個人政治意見的爭論焦點，不僅充斥意識形態的偏見，更始終沒有被認真的客觀研究，且也受限於文獻材料的取得，而難有專門研究著作。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關於「台獨」問題〉一文，首先，此篇文章僅是蘇新晚年的個人手稿，並未在他生前刊登於任何傳媒上，且以現代的學術格式標準來看，算不上是一篇正式的研究論文，同時也礙於意識形態與政治壓力下，同樣帶有立場偏頗的問題。但就單獨以台灣獨立運動作為研究主題，將歷史上所有出現過的台獨運動一一做客觀分析，從這一特點來看，蘇新已遠遠超越時代背景的侷限，且比較起當代討論台獨的文章多是帶有漫罵、斥責的政治偏見，蘇新文中呈現的個人意識形態並不過於偏激，用字遣詞相當含蓄、平靜，甚至將台獨運動者正、反面立場的緣由都鋪陳得相當周全，因此，〈關於「台獨」問題〉一文相當具有仔細探討的價值存在。

在〈關於「台獨」問題〉的第一段，蘇新即開宗明義的宣告台獨的意義與本質為何，且聲明他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並強調他從流亡香港開始就不斷提倡的回歸祖國的概念：

¹⁹¹ 陳佳宏，《海外台獨運動史：美國「台獨」團體之發展與挑戰，50年代中至90年代中》，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頁7-8。

什麼叫「台獨」？「台獨」就是「台灣獨立」的簡稱，是指「台灣獨立運動」，或者指「搞台灣獨立運動的人」。「台獨」既然是「台灣獨立」，那麼，在當前中國的國內外形勢下，就是要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這是和「台灣歸回祖國」、統一中國的方針相違背的。¹⁹²

而後蘇新整理出曾經主張過台灣獨立的運動與相關團體，總計有九項，依時間順序分別是台灣民主國、舊台共的獨立運動、戰後日本軍人扶植台獨事件、美國主導台灣分離運動、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台灣獨立聯盟、台灣人民社會主義聯盟、擁蔣台獨以及傾向台獨的民主人士，¹⁹³在這歸納出的九項台獨運動中，蘇新認為只有台灣民主國與舊台共所主張的獨立運動是可以肯定的：

台灣，歷史上也有過「台獨」，例如一八九五年的「台灣民主國」的抗日戰爭；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台灣共產黨的政治綱領也提出「台灣獨立」。我認為這兩次「台灣獨立運動」是正確的、進步的、愛國的。所以，不能一聽到「台灣獨立」就認為都是賣國的，要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來分析，看是從哪一個宗主國分離出去，分離出去以後要幹什麼，才能正確判斷是愛國的，還是賣國的。¹⁹⁴

因此就以獨立建國所欲脫離原屬國這項原則來看，台灣民主國的建立是爲了脫離從清廷手上接收台灣的日本帝國，並不是想脫離祖國中國，選擇獨立是萬不得已的抉擇：

「台灣民主國」的成立是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李經芳和日本總督樺山資紀舉行「台灣授受儀式」以後。按《馬關條約》和國際

¹⁹²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58。

¹⁹³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59-291。

¹⁹⁴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58。

慣例，此時台灣已經成為日本的領土，主權已經不屬於大清帝國。所以已經談不上從祖國（清國）分離的問題。當時「台灣民主國」的成立，只能是為了抗拒日本接收台灣，是為了反對日本的侵略和統治。清廷把台灣這個孩子送給日本，但這個孩子不願意認日本做爸爸。能怪這個孩子，你為什麼離開媽媽？¹⁹⁵

蘇新認為台灣民主國的建立是雙重反抗，一是反抗日本帝國的侵略，一是反抗清廷放棄台灣，只是不想脫離中國的祖國而已，這是情有可原的台獨運動。同樣的道理也可套用在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獨主張，蘇新強調在日本治理下的台灣人民遭受嚴重剝削與長期屈辱，打倒日本帝國資本主義建立新國家，不僅符合台灣島上各民族、階級民眾的利益，而且也相當符合當時第三國際的殖民地建國方針，甚至，蘇新認為當時的民族矛盾大於階級矛盾，走向獨立是理所當然：

當時的台灣，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兩相比較，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當年，我們是這樣分析台灣社會的。所以把當年的台灣革命的性質規定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獨立」。我認為是正確的。¹⁹⁶

因此，蘇新認為台灣民主國與台灣共產黨的台獨，皆建立在於反抗外來民族統治的基礎而順理成章，至於台共的台獨主張達成後的台灣，是否應該回歸中國，蘇新則提出了這樣的解釋：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後，台灣應不應該歸還中國，舊台共的人並不是沒有考慮過……當時，整個中國正由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

¹⁹⁵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60。

¹⁹⁶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65。

義代理人蔣介石統治著，中國人民正在進行「打倒國民黨」的人民革命戰爭。在那樣的情況下，在台灣的共產黨人能提出「台灣歸還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舊中國」嗎？¹⁹⁷

當然，蘇新的這一套說詞，與他在光復初期的政治態度與行動是明顯相互矛盾，若真是因為階級矛盾而想積極打倒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那最適合發動武力革命的時機，就是在政治腐敗、經濟崩潰的光復初期，但很確定的是蘇新當時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因此，事過境遷後自圓其說的成分可能較大。

蘇新將他所提及的九項台獨運動整理出六種台獨思想觀點，並論述他們理論的根基，首先提到的是「外來侵略論」，這項論點認為，台灣歷代統治者皆以武力入侵統治台灣，從西班牙、荷蘭、鄭成功、清朝、日本以至國民黨，都是外來侵略者，統治完全沒有經過台灣人民的同意，不具正當性。持此觀點的台獨人士認為台灣人民應該反抗外力的入侵，獨立建國抵禦外來勢力的侵略。另外，在此特別提到蘇新歸類的第五種台獨觀點，「侵略台灣論」，其理論認為中共企圖以武力併吞台灣，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的政治紛爭而產生，與台灣民眾毫無相關聯。蘇新特別提到這個觀點的破壞性很強大，許多台灣人民的台獨思想或傾向就是受其影響，但若以第一項外來侵略論的角度來看，兩種理論的依據根本沒有差異，實則無獨立而出的必要。¹⁹⁸

第二種觀點為「台灣民族論」或稱「民族自決論」，這理論認為除了原住民族外，源自中國漢族的福佬人與客家人，因為歷史、地理、政治及經濟社會的特殊條件，長久時間形塑成新一種民族，而根據民族自決的原理，台灣人既是一

¹⁹⁷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66。

¹⁹⁸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3。

支民族，就應該建立自己的國家。¹⁹⁹第三種理論是「非中國領土論」，此派人士將台灣民主國作為台灣獨立建國的重要歷史指標，他們認為自從台灣被清朝割讓予日本後，台灣人民為反抗日本統治而建立台灣民主國，是為台灣獨立建國的基準點，也因此日本二戰的戰敗後，就應當把台灣歸還給台灣人民，因為台灣人民曾經短暫獨立建國過，只是國祚過短以至容易讓人遺忘它的存在，持此論點的人即認定戰後中華民國接管台灣是不具統治正當性，應將主權還予台灣人民。²⁰⁰

第四種為「台灣地位未定論」，或稱「公民投票論」，持此論點的人士認定日本自二戰投降後，臺灣的國家定位問題就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所謂開羅宣言、波茲坦宣言提及將臺灣還給中國僅是一種聲明而已，並無法律上的約束力，日本雖然聲稱放棄台灣，但台灣應歸屬於何國或應否獨立，必須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²⁰¹最後一種論點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論」，這項理論認為一個民族可以形成數個國家，如同從英國分離出去的美國、澳洲、加拿大與紐西蘭，或是東德與西德、南韓與北韓，都是著名的歷史案例，同樣的道理也可適用於台灣。²⁰²

面對持各式主張依據作為立論基礎的台獨觀點，蘇新皆一概否定它們的理論正當性，而他所秉持的立論基礎在於，台獨運動完全忽視民族國家建立的基礎，也就是民族血統因素：

「台獨」的先生們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他們最大的錯誤是：他們把台灣和大陸孤立起來，不懂大陸的歷史，也不懂台灣的歷史，更不懂台灣的歷史和大陸的歷史的關係。特別是，不了解血統是構成民族的決定性因素，也是產生民族感情的最決定性的東西

¹⁹⁹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2。

²⁰⁰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2-293。

²⁰¹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3。

²⁰²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3-294。

蘇新言下之意，即是強調在前述《憤怒的台灣》一書中的大中國歷史觀，在這歷史觀下的台灣是與中國數千年互相緊密結合，雙方民族血緣起於同一源頭，兩岸人民因而密不可分，台獨的主張無疑是切斷血緣。而蘇新也補充，臺灣人民之所以會認為兩岸人民並不是同種同源，原因在於國民黨的殘酷統治，讓台灣人民認為大陸人即是外來民族，不把台灣當作自家人看待，本是階級之間的鬥爭意外轉變成民族之間的矛盾：

台獨各派有一個共同的、最大的錯誤，就是把國民黨人當作外來的異民族侵略者，把大陸的人稱為「中國人」、「中國民族」、「中華民族」，把原來的台灣人稱為「台灣民族」，故意製造一種民族矛盾，把台灣的革命鬥爭說成是「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獨立運動」。²⁰⁴

因此，〈關於「台獨」問題〉一文中，可以看到蘇新不斷強調民族血緣的重要性，也多次聲明台獨不僅不具備正當性，更沒有客觀條件與任何政治利益可言，

我們的回答是：(1) 台灣獨立，對台灣人民不利（當然對民族，對整個中國，都不利）；(2) 沒有俱備條件，因為首先多數台灣人民不同意，祖國人民不答應，中國政府不允許，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承認「台灣國」。²⁰⁵

可是上述認為台獨不會帶給台灣人民任何益處的聲明，蘇新沒有更進一步闡述理由為何，僅是空泛的表示他個人反對台獨的主張。且相當諷刺的，就在此文

²⁰³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4。

²⁰⁴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66-267。

²⁰⁵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4-295。

撰寫前一年，1979年1月1日，美國國會通過的《臺灣關係法》正式生效，內文承認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²⁰⁶為此北京當局的抗議甚至持續到今日，加上從國際政治上的各式案例皆可輕易得知，一個民族分為數個國家是普遍可見的事，蘇新濃厚的民族情緒再度忽視了政治現實。

但若撇開蘇新少部分的民族情緒觀點，〈關於「台獨」問題〉一文其實已經相當充分的描述所有的台獨理論觀點，即便以今日對於台獨的專門研究來審視，蘇新已將各式台獨理論作出相當完整的論述，且更值得一提的，這篇文章撰寫於距今三十多年前，以當時台獨運動仍在海外熱烈進行的同時，蘇新就己能掌握活動的資訊並予以統整，由此可見其台灣獨立運動研究的結構完整度，已經達到一個相當成熟的水平。

最後，此文後半段是整篇文章最為獨特的部分，論述完台獨的各式運動與理論思想後，蘇新統整出台獨思想產生的背景原因，以及對待台獨人士的態度應該為何。首先，在台獨思想產生背景原因的探討，他跳脫出本身既有的政治立場，同情台獨人士的主張，這無疑是當代反對台獨的政論文章中最為特殊之處，他指出原因共有四項。蘇新首先提出，之所以會出現台獨思想，是台灣人民對於國民政府的徹底絕望，除了光復初期的政治腐敗與失能外，當時民族歧視性的政策更是台獨思想的強力催化劑：

當時國民黨的接收大員除了表現出貪汙無能以外，對台灣人民實行「異民族式」的歧視政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各個領

²⁰⁶ 《臺灣關係法》，(美國在台協會官方網站 <http://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html>)，
《臺灣關係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臺灣」一詞將視情況需要，包括臺灣及澎湖列島，這些島上的人民、公司及根據適用於這些島嶼的法律而設立或組成的其他團體及機構，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臺灣治理當局，以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包括政治分支機構、機構等）。

域，沒有不歧視台灣人民的，極端地損害了台灣人民的自尊心。²⁰⁷

文中也舉了不少族群歧視的案例，舉凡在就業、居住、社會福利等等，說明國民政府民族歧視政策的嚴重錯誤。²⁰⁸另外，蘇新更指出，台灣人民在國民黨統治之前，是不曾出現過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想法，直到了國民政府的統治：

國民黨三十多年來，對台灣人民實行了極端殘酷野蠻的政治迫害……「二二八事件」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殘無人道的、滅絕人性的暴行，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台獨份子把國民黨對臺灣的統治說是「異民族的壓迫」，是從這裡產生的。²⁰⁹

第二項產生台獨思想的原因，蘇新認為是肇因於外國的陰謀，他舉出各種歷史案例，如戰後部分日本軍人鼓動台人獨立、廖文毅的台灣臨時政府、美國醞釀的託管分離運動，以至 1970 年代海外台獨運動，都是美、日反動派的陰謀，意圖在於阻止中國統一台灣，將台灣變成資本主義的新殖民地。因此，蘇新認為不應該將脫離祖國的罪惡加諸在台獨人士身上。²¹⁰第三種原因，蘇新歸咎於中國共產制度的失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治動盪與文化浩劫，讓台灣人民對於祖國產生了懷疑：

林彪、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法西斯暴行，使台灣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了懷疑與害怕。這一點，我們不能把全部責任都歸於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台灣人民懷疑：為什麼大陸解放後這麼多年，經濟建設、科學技術還這樣落後，人民生活水平還這樣低？一個大學畢業生，工作了二十多年，還是六十多

²⁰⁷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6。

²⁰⁸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6。

²⁰⁹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6。

²¹⁰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7。

元，怎麼叫台灣同胞嚮往社會主義祖國？²¹¹

因此，台灣人民會省思，認為蔣氏政權必須打倒，而中共又不能依靠，那乾脆自立自強、獨立建國，蘇新認為這種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最後一種原因，蘇新指出是長期悲情歷史遭遇，造就台灣人的建國意識，由於台灣的歷史總是遭到他國支配，遭受歧視、地位低落，淪為沒有國家的奴隸一般，外族統治者的來來去去，讓台灣人民深刻體認獨立建國的必要：

台灣人有一種很重的歷史包袱。他們受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受盡一切政治迫害，經濟剝削和民族歧視。他們長期處在「亡國奴」、「二等公民」的地位。這種歷史遭遇造就了他們的特殊的性格。他們極端仇恨外來統治者，他們共同的願望是擺脫「二等公民」的地位，自己當家做主，不甘心長期被支配。²¹²

因此就在這種不願被外來民族歧視的內在壓力下，自己當家做主、終結悲情歷史不斷輪迴的命運，台獨思想因此從內部孕育而出。最後，在探討台獨思想的背景原因後，蘇新提出了他獨特的個人見解，縱然台獨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是不容許存在的想法，但他完全不同意打擊台獨份子，反倒是應該積極吸收、爭取台獨勢力，以對抗國民黨與資產階級：

最重要的是爭取台灣島內的「黨外人士」和支持他們的廣大群眾。這批「黨外人士」已經集結在美麗島雜誌周圍，包括當前台灣最有影響的各種政治傾向的人物。雖然由於高雄事件被捕了許多人，他們的活動可能暫時處於低潮，但是台灣人民的反蔣鬥爭絕不會停

²¹¹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8。

²¹²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298。

他將美麗島事件的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定義為反抗蔣氏政權的鬥士，認為他們擁有廣大民意支持，不僅不該打擊他們，更應積極吸收他們，有朝一日可以透過他們的協助摧毀蔣氏政權、解放台灣，同時，蘇新強調台灣獨立運動並不存在於台灣本島之內：

真正搞台獨的是在美國和日本的一小撮，也不過是做些宣傳（辦刊物、電話台、台灣之音）搞一些什麼遊行而已，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具體行動……在台灣島內，實際上不存在「台獨」，說台灣島內有「台獨」（運動），是海外的「台獨份子」和國民黨故意誇大了的。²¹⁴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蘇新始終不願承認島內本土台獨運動的存在，甚至認為海外的台獨運動，也絲毫沒有影響力，不過是文宣工作的傳播，若真有影響力存在，也是國民黨為打擊民主運動人士，而渲染出台獨的威脅性罷了。

縱觀蘇新對於台獨運動的個人詮釋觀點，可以看出，即便他晚年幾乎已經沒有任何政治活動及實質影響力，其政治思想依舊活躍於紙筆之上，且始終堅信基於相同民族血緣的信念基礎上，否定台灣獨立的任何可能性，極力倡導兩岸統一。雖然，晚年的蘇新仍秉持解放台灣的政治熱誠，但〈關於「台獨」問題〉一文並未因個人政治立場而偏激化，相反的，他從歷史的角度描述臺灣歷來的各式台獨活動，解釋他們的動機、理論及想法，甚至相當獨特的替台獨人士緩頰，縱然兩方政治立場是毫無妥協性的對立，蘇新仍然理性的詳細論述他們思想緣由，

²¹³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300。

²¹⁴ 蘇新，〈關於「台獨」問題〉，《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300-301。

是因爲種種歷史因素使然而形成，並認爲台獨思想的產生是情有可原，不應完全否定，甚至應該積極拉攏台灣民主人士。相較於當代各式充滿激進政治意識形態的台獨文章，如此可以看出蘇新政治思想於晚年階段漸趨成熟圓融。



結論

綜觀蘇新橫跨將近半世紀的革命旅程，其政治行動不僅相當活躍，面對各式政治迫害所需的勇氣、與膽識，無疑令人尊崇。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他終身的政治宗旨，顯而易見，即是期望將永遠的故鄉台灣帶往無產階級的公平社會理想，縱然在他遠離故鄉投入中國共產黨的後半生，一心所繫的仍是台灣。自詡為終身共產黨員的蘇新，對於在台灣這塊島嶼上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都是他亟欲抨擊的敵人，但本應以「階級」為判准來辨識政治敵人的蘇新，似乎因為他對於中國的民族情感認同，而讓「民族」與「階級」成為了蘇新追求的雙重政治目標，更嚴格來說，他在追求兩岸統一的關注力，遠比打擊統治、資產階級來的強大許多。

探究蘇新後半生涯各階段的政治行動與言論，可以輕易查覺與他在日治時代投入武力革命運動，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從現有的史料可得知，日治時代的蘇新視日本人為壓榨台灣人民的帝國主義，因而有相當明確具體的激進抗日立場與行動，但到了戰後光復初期，台灣局勢面臨空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卻不見蘇新絲毫批判國民政府，仍舊將當下的日益惡化的政局推諉給在台日人與台籍仕紳，而對於外省族群抱持著崇敬與同情維護的態度，到了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後，也不見蘇新有任何實際反抗或紙筆上的強烈批判。往後輾轉流亡至香港，在香港期間除編寫中國史觀的台灣歷史，不斷散播反蔣、反美、反台獨的消息給報界，試圖影響兩岸人民的輿論，在轉入中共後，蘇新長期從事對台宣傳工作，儼然成為中共的傳聲筒，即便晚年遭到鬥爭迫害，他仍秉持中國民族統一的信念，堅定認為台灣應回歸祖國的懷抱。

綜上所述，蘇新一生中不斷以「民族」作為判准在尋找政治上的敵人，而非「階級」，按照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來看，一個共產主義運動者的政治行動，不外乎是打擊壓榨勞工、農民的統治與資產階級，最理想的政治目標即是推翻政府奪取政權，以實施財產重新分配，一如列寧於 1917 年推翻沙俄，爾後以俄羅斯為中心，扶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以期奪取國家政權，這也是蘇新與台灣共產黨在日治時代的主要政治目標，縱然失敗，但到了戰後光復初期卻不見蘇新批判國民政府的施政腐敗，反倒歸罪於在台日人，爾後轉往中共，儼然成為中共統戰台灣的傳聲筒。這些本是令人費解的種種疑問，若以民族主義的角度就得以獲得解釋，蘇新基於大中國主義作為其政治意識形態的基礎，打擊任何可能導致中國民族分裂、台灣分離中國領土的個人、黨派或是國家，而非真正針對造成台灣階級對立矛盾的政權與資產階級。

本文以「民族」、「階級」矛盾作為解釋蘇新各個階段政治立場轉折的推論，並不算是太過新奇的觀點，民族主義帶來的矛盾，始終在共產主義的歷史中糾纏不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民族主義就曾給予共產主義運動致命一擊，民族國家的號召力量，終究是讓廣大無產階級人民放下階級認同，拿著武器為祖國衝上了戰場，而讓擁有橫跨歐洲數千萬社會主義政黨成員，追求世界無產革命的第三國際瞬間崩解。即使蘇聯建立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也因為民族問題而破壞了社會主義追求的經濟平等原則，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於 1930 年代建立各國分工的集體經濟制度，其帶來的飢荒卻讓蘇聯境內的大量少數民族受害，歷史學家也指出這樣的悲劇多少是史達林刻意的種族清洗政策。

二戰過後，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共產世界集團，仍延續了這種民族不平等的分工制度，民族矛盾仍存在於各個共產國家間的關係中，從捷克布拉格之春、匈牙利革命、俄中衝突、中越戰爭到柬越戰爭，從上述的歷史案例來看，就可得知共產集團內部成員間，是存在著不平等的緊張關係。綜觀看來，實施共產制度的國

家政權及領導人，雖然標榜著共產、均富這種類似平等原則的價值理念，但在面臨民族問題時，往往被民族主義破壞而造成民族之間的差別不公，使共產社會成為烏托邦式的空談，不僅對國內辦不到經濟平等，對外也要面臨民族國家戰爭，共產國家的運作及面臨的紛爭，仍然是以民族為核心在運行著。而這個綿延將近一世紀的「民族」、「階級」歷史矛盾，也同樣發生在蘇新與每一個左翼運動者身上。

因此本文在此做出總結，基於對中國民族認同的情感基礎，自視為中國漢族的共產運動者蘇新，於戰後各個階段的政治「敵人」從來不是壓迫台灣工、農階級的統治、資產階級，而是各個時期與中國敵對或不利統一台灣的國家、黨派及人物，如此才能解釋蘇新為何抵抗日本異族政權，到了光復初期卻不批判國民政府，然後在國共內戰期間批判國民黨盤據台灣，且又於中共時期放棄階級革命的角色，不斷向台宣傳統一。

但本文以民族主義角度所做的分析推論，並不就此將蘇新定位為全然的民族主義者，毫無共產主義的階級批判精神，況且每一位歷史人物的思想與行動，皆受到當時代的歷史情境孕育而成，換言之，蘇新的政治思想與行動是有歷史背景的侷限性存在，因此，本論文運用現代的觀點對蘇新過往的思想與行動予以評判，或許是不甚公允的舉措，但筆者僅欲著重強調政治運動者的政治思想，是可包涵多種不同面向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間彼此之間可以互相合作、包容，但也可能互相矛盾、衝突。從蘇新的個案來看，即是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兩種意識形態間的矛盾，只是在民族情緒的強大影響下，蘇新的共產主義思想屢屢無法實踐成為政治行動，而成為附屬於民族主義之下的次要意識形態。

參考書目

一、史料

汪大淵著，蘇繼局校釋，《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二、專書

王子毅，《台灣》，自由出版社，1944年。

丘光明，《中國古代度量衡》，臺北：臺灣商務，1994年。

毛澤東，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六冊，東京市：蒼蒼社，1983年。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臺北：帕米爾出版社，1987年。

古瑞雲，《臺中的風雷》，臺北：人間出版社，1990年。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臺北：草根文化，1998年。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

柯喬治(George H. Kerr)，《被出賣的台灣》，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

徐子爲、潘公昭，《今日的臺灣》，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1945-46年。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

楊克煌，《台魂淚（二）：我的回憶》，臺北：楊翠華發行出版，2005年。

鄭學稼，《第三國際史》，臺北：商務，1977年。

臺灣省糧食局(編)，《臺灣糧食統計要覽》，1949年。

陳若曦，《現代小說叢刊》，臺北：聯經出版社，1978年。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臺北：麥田文化，2009年。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文化，2006年。

陳佳宏，《海外台獨運動史：美國「臺獨」團體之發展與挑戰：50年代中至90年代中》，臺北：前衛，1998年。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文化，1993年。

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2012年。

戴天昭，《台灣國際政治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

霍布思邦(Eric Hobsbawm)，《極端的年代》，臺北：麥田文化，1996年。

簡炯仁，《臺灣共產主義運動史》，臺北：前衛，1997年。

蕭欣義，〈祖國臍帶誰剪斷？中台關係史的回顧〉，《台灣之將來：學術論文集》，高雄：新臺政論雜誌，1986年。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93年。

蘇新，《憤怒的臺灣》，臺北：時報文化，1993年。

蘇新，《永遠的望鄉人-蘇新文集補遺》，臺北：時報文化，1994年。

鐘逸人，《辛酸六十年》，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年。

三、期刊論文

李筱峯，〈二二八事件前的文化衝突〉，《思與言》第二十九卷第四期，1991年。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 總論明人的台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第四十期，2007年。

張炎憲，〈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研院三民所，1984年。

楊亮功、何漢文，〈調查「二二八」事件報告〉，《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陳純瑩，〈光復初期臺灣警政的接收與重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1)，臺北：中央研究院，1993年。

陳儀深，〈論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2年。

陳儀深，〈台獨主張的起源與流變〉，《台灣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

顏清梅，〈光復初期臺灣米荒問題初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1)，臺北：中央研究院，1993年。

四、學位論文

黃文源，《蘇新的革命道路——一位台共在東亞共產運動的矛盾與困境》，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博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2010年。

五、網路資源

《臺灣關係法》全文 <http://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html>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9/content_696160.htm

六、英文專書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8.

表附錄

表 2-1	二二八事件前十年台灣米糧生產概況.....	26
表 2-2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臺灣各警政機關的主管及其籍貫統計資料.....	27
表 2-3	光復初期前四年台北市物價指數.....	29

